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编者的话

当前，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毛主席关于“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认真读书，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把学习和批判、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焕发了革命精神，促进了团结，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深入发展。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当前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继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削弱和铲除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措施。

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创立的儒家

学派，厚古薄今，主张开历史倒车。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大力宣扬孔孟之道，他们一方面对反动的儒家“经典”大肆吹捧，不断加工，把它当作宗教教条一样传宗接代，强迫人民信奉；另一方面，又炮制了各种“通俗读物”和反动小册子，向劳动人民和青少年灌输，毒害人民。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刘少奇、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极力求救于孔孟的亡灵，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武器，把宣扬孔孟之道的各种反动小册子作为他们制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之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对这些孔孟之道的大杂烩进行分析批判，清除其流毒，很有好处，很有必要。

从去年以来，我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注释法家著作，深入批判儒家的书和各种反动小册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反映这方面的成果，我们汇编了这本小册子。

书中选编了天津市工农兵批判《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神童诗》、《弟子规》、《改良女儿经》等共十一篇文章。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在收入本书时作了些修改。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七五年六月

目 录

反动没落阶级的复辟经

——批判反动小册子《三字经》

.....中共天津市宝坻县委理论小组 (1)

《千字文》批判

.....天津市工交建“五·七”
千校二队理论研究小组 (11)

《名贤集》是孔孟之道的大杂烩

.....中共天津市武清县委理论小组 (19)

《神童诗》是培养反动阶级接班人的黑教材

.....共青团天津市委机关 李 岩 (31)

一本毒害青少年的黑书

——批判反动小册子《弟子规》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理论小组 (40)

《幼学琼林》批判

.....天津市市政工程局 史 正 (51)

《朱柏庐治家格言》是欺世惑众的妖言

.....中共天津市西郊区委 郗红文 (61)

《二十四孝图》批判

.....中共天津市东郊区委 董 皎 (71)

批判阻挠妇女解放的《改良女儿经》

.....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宣传部 (78)

深批《女孝经》，顶起“半边天”

.....天津市电业局大批判组 (91)

批判毒害劳动妇女的封建专书《女诫》

.....天津市卫生局 丛 文 (98)

反动没落阶级的复辟经

——批判反动小册子《三字经》

中共天津市宝坻县委理论小组

《三字经》相传是南宋末年反动儒生王应麟编纂的，以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又多次进行了增补。这本小册子通篇都散发着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观、历史观、教育观和封建伦理道德观的臭气。因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都极为欣赏，竟把它吹捧为“袖里通鉴纲目”、“小型百科全书”，当作“初学”“首读”的“启蒙”课本。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出于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也对《三字经》大加鼓吹，不但扬言要继承这份“遗产”，而且还亲自出马兜售《三字经》里所宣扬的黑货。我们今天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这个反面教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对于深入批林批孔，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意义的。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为了欺骗人民，维护他们的反

动统治，总是极力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千方百计地抹杀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三字经》的炮制者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出发，编造了所谓“天才”的神话，胡诌什么：“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等等。《三字经》的炮制者，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斗争史，歪曲为一部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在这本反动小册子里，用了三分之一还多的篇幅，历数了从第一代奴隶主头子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功绩”；而对于创造了历史的劳动人民却肆意咒骂，并且恶狠狠地把农民的反抗斗争诬蔑为“寇”“盗”作乱。这就充分说明了《三字经》的炮制者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三字经》是一株仇视劳动人民的大毒草。

人的知识才能是从哪里来的？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个问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斗争的焦点。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三字经》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宣扬“天才”、“神童”，是为了贩卖“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黑货，把反动统治者捧为受命于天的“天才”，从而维护这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的特权，让劳动人民永远甘心受其奴役和压榨。

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三字经》的炮制者出于他反动没落阶级的立场，从儒家的故纸堆里抄抄拣拣，搜集一些吹捧帝王将相的鬼话，干着篡改历史、颠倒历史的勾当。什么“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的反抗斗争，没有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起义革命，没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社会就不会变革，人类历史就不能发展。《三字经》拚命鼓吹“天才论”和唯心史观，目的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是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的。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孔老二“天命论”的吹鼓手。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他抛出的那篇“政变经”，和《三字经》同出一辙，抹杀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抹杀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依林彪之流的意志为转移的。到头来，林彪这匹“天马”连同他的“天才论”一起去见孔老二了。

二

《三字经》开头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胡说人一生下来就具有“善”的本性，极力鼓吹“性善论”，并且宣扬“性相近，习相远”的谬论。意思是说

“善性”虽然先天“人皆有之”，而后天却不是人人都能保持的。那么谁能保存“善性”呢？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先天的“善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能保存，劳动人民是不能保存的。后来西汉的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性三品”的荒谬理论，他把人性分成三种：“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胡说上等的“圣人之性”天生就是善的，“中民之性”通过学习可以变善；至于“斗筲之性”，也就是“卑贱”的劳动人民，则先天就是“愚蠢”的。按照这种反动理论，一个天生性善，一个天生性恶，一个绝对聪明，一个绝对愚蠢，因此，反动统治阶级就应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劳动人民只能当牛作马，世世代代受剥削压迫。由此可见，《三字经》所鼓吹的“性善论”完全是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的翻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善性”。人性的善和恶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而是后天社会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或“相近”的“善恶观”，善和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是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标准的。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善”的东西，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就是“恶”的东西。反动阶级从来喜欢讲“性善论”，可是他们对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行过“善”。地主阶级常标榜他们是“大善人”，而实际上是压榨剥削

农民到了骨碎髓干也不肯罢休的吸血鬼。至于“人性”这个东西，“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解放前，广大工人和贫苦农民由于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因此，要反抗，要斗争，要革命，这就形成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反抗剥削压迫的敢于斗争的本性；而地主、资本家唯利是图，剥削成性，他们的社会地位当然也就养成了他们剥削阶级的寄生虫的本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与地主、资本家作为社会性的“人性”是根本对立的，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点。《三字经》宣扬的“性善论”是为了愚弄劳动人民而编造出来的，是骗人的鬼话，其目的是妄图利用“性善”的说教，抹杀阶级界限，掩盖阶级矛盾，扼杀人民革命斗争，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三

“孝悌”在《三字经》这本反动小册子里占有突出的地位。“首孝悌，次见闻”，这就是说，人们在社会上首要的是讲孝道，讲尊兄敬长，然后才是其它。为了说明“孝悌”是“首”，《三字经》里还树起了两个“孝悌”的黑样板，大肆渲染。一个是“香九龄，能温席”，即被儒家鼓吹的所谓“二十四孝”中的大孝子黄香；一个是“融四岁，能让梨”，即孔老二的二十代孙，因结

党营私、搞分裂倒退，疯狂反对法家路线，被曹操杀掉的反动儒生孔融。

在《三字经》的炮制者看来，一个九岁的孩子、四岁的娃娃都懂得“孝悌”，自然，“孝于亲，所当执”，“弟于长，宜先知”了。

《三字经》的炮制者为什么这样狂热地鼓吹“孝悌”呢？其思想来源还在儒家鼻祖孔老二那里。孔老二在一生中对“孝悌”的宣扬，可谓使尽了吃奶力气，他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两种品德，当作“仁”的根本，鼓吹要“入则孝，出则悌”。其目的是为了阻止人们“犯上作乱”，以维护已经“礼崩乐坏”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在奴隶社会，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统治，天子就是诸侯的家长或兄长，诸侯之间也都是亲属关系。因此，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在形式上有一些就表现为父子相杀、兄弟相争。这也就不难理解，孔老二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自然就拚命宣扬“孝悌”，把“孝悌”奉为“克己复礼”的根本。在他看来，只要人们具备了“孝悌”的所谓美德，对奴隶主贵族的“犯上作乱”的事也就没有了。可见，孔老二把“孝悌”当作“忠君”的前提，“忠君”才是“孝悌”的目的，“孝”是为“忠”服务的。鼓吹“孝悌”，其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宗族关系，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起来进行夺权斗争。《三字经》的炮制者从维护南宋

王朝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立场出发，接过孔老二“孝悌”衣钵，著书立说，编成顺口溜，搜罗和编造黑样板，妄想让人们象黄香那样从小就孝顺父母，象孔融那样四岁就尊重兄长。以此来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要人们从小就严格地遵守封建的伦理道德，俯首贴耳地听从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孝悌”是一条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是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毒害人民的思想武器。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从儒家的书中摘录了许多有关“孝悌”的词句，叫嚷对“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就是妄图用这一套腐朽不堪的封建伦理道德毒害人民。他不是要他的法西斯小舰队按照“事父母敬而不违”、“以从亲之令为孝”的精神，服服帖帖地听从他的指挥吗？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林彪怎样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跟他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孝悌”思想绝对挽救不了他必然灭亡的命运。

四

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三字经》还极力鼓吹“三纲五常”。说什么“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等等，妄图用这种君臣尊卑等一整套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永远服服帖帖地听任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压迫。如果谁要违反这

种伦理道德，起来造反，“以下犯上”，“以卑凌尊”，那就是“大逆不道”，就要遭到残酷镇压。由此不难看出，《三字经》所鼓吹的“三纲五常”实际是封建统治阶级反革命暴力的补充。林彪一伙出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竭力宣扬“三纲五常”，胡说什么：“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中国的旧道德……在现在可以成为新的美德”。他们还叫嚷：“妇女要把精力放在丈夫身上。”妄想用“三纲五常”这套封建伦理道德继续毒害人民，把妇女关在家庭小圈子里，成为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庸人，好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也正是这“四权”观念的理论基础。在旧社会，“三纲五常”这套反动的封建道德观念，坑害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广大劳动妇女，受的苦难更深。她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受歧视，生活上受虐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多少妇女为了反抗封建礼教含恨而死，作了“三纲五常”的牺牲品。“三纲五常”是反动统治者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在新社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劳动妇女和广大劳动人民一

样，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种田到做工，从飞行到航海，从高空作业到井下采掘，从文教科研到练兵打仗，处处都有妇女同志参加。新中国的妇女顶起了社会主义的“半边天”！

五

《三字经》还以大量篇幅贩卖“读书做官”的黑货。它搬出大恶霸、大官僚地主窦燕山教子读书做官的黑样板以后，又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串尊孔读经、升官发财的黑典型，什么“披蒲编，削竹简”啦，什么“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啦，“若梁灏，八十二”中状元啦，等等。《三字经》端出这些黑货，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只要熬得十年寒窗苦，就能成为人上人”，既升官，又发财，光前裕后，封妻荫子。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他反动的剥削阶级本性，也大肆鼓吹“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谬论，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他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广大干部和知识青年引向脱离实践、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的邪路，成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在教育问题上，历来就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

具，每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用本阶级的世界观教育青年一代，为本阶级培养接班人。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教子尊孔读经，闭门修养，走升官发财、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反动道路。我们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就为青年指出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在一九六八年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几十年来，广大知识青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批的青年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与工农相结合，成为三大革命运动中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这是对孔孟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点和林彪的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

《三字经》这本通篇都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反动小册子，长期流传，流毒甚广，影响很坏。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荡涤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指引下，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

《千字文》批判

天津市工交建“五·七”干校

二队理论研究小组

《千字文》出笼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期——南朝梁代，由反动儒生周兴嗣编纂而成。它是浸透孔孟之道毒汁的卫道文，是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文，是欺骗和麻醉人民的害人文。

南朝梁代的梁武帝肖衍，是个伪善而残忍、愚蠢而贪婪的反动统治者。他依靠的是最反动最腐朽的社会势力，大封同姓宗室，封兄弟子侄为诸王，使诸王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起用百家士族，让他们占据显要，给他们在政治上抬头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不耕不织，锦衣美食，巧取豪夺，世卿世禄。梁王朝实际是世家豪族、僧侣地主的专政。

反动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造成广大农民的极端贫困，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梁王朝为了维护它的残暴统治，就制礼作乐，大兴佛教，愚弄人民群众。激烈的社会阶级矛盾，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了以范缜为代表的“神灭论”同以梁武帝为代表的“神不灭论”的大论

战。这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上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这次斗争有力地冲击了以梁武帝为代表的复古倒退反动思潮。当时，梁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大动乱迫在眉睫，《千字文》就是在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势下抛出来的。

《千字文》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和奴才而编写的。《千字文》问世以后，反动统治者大加赞赏，说什么“《千字文》，值千金”，象是捞到了救命稻草。这篇反动作品虽只有一千字，但它是传播孔孟之道的大毒草。

鼓吹“克己复礼”，恶毒攻击法家，为推行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

《千字文》一开头，就讲了一通“天地”、“日月”、“寒来暑往”、“海咸河淡”之类的现象。这不单纯是谈自然，实质是宣扬“天不变”的反动哲学。宣扬“天不变”，是为了鼓吹“道亦不变”。

《千字文》竭力吹捧殷周奴隶主头子的所谓“功德”，说什么“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育黎首，臣伏戎羌……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这是颠倒历史的恶意编造。《千字文》把奴隶主头子的黑暗统治描绘成为王道乐土，天下太平，劳动人民得到爱护，甚至连草木都受到恩泽。美化奴隶制，就是妄图使之复辟。《千字文》鼓吹“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

把商汤、周武王的政治吹捧成最美好最理想的政治，简直美好到无以复加了，因此，社会就应当回到奴隶制时代去，这完全是孔老二、孟轲一再宣扬的“克己复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那套货色，是不折不扣的儒家复古倒退的唯心史观，完全是为梁武帝推行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儒家这种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早在先秦时期就受到法家的严厉批判。韩非就用历史事实说明社会是发展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古的，他斥责鼓吹复古倒退的儒家是守株待兔那样的蠢人。《千字文》顽固坚持儒家反动历史观，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向后看，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反动地主阶级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千字文》根本不提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这绝不是遗漏或省略，而是别有用心，妄图抹杀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推动了历史前进的历史功绩。韩非总结发展了前期法家的理论学说，对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韩非主张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严厉镇压，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主张。但《千字文》的炮制者却攻击这种革命暴力是“烦刑”，恶狠狠地咒骂韩非死在狱中是受到了报应！这就完全暴露了反动派对进步革新势力的刻骨仇恨。《千字文》美化奴隶主头子，咒骂秦始皇，攻击韩非，这一褒一贬，充分暴露了其尊儒反法、妄图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

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往往以周文王自命，并一贯鼓吹孔孟之道，来掩盖其倒行逆施的狰狞面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自比文王，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举起“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黑旗；他咒骂秦始皇，咒骂法家是“罚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残暴”，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两千多年来，从孔老二、梁武帝到林彪，这些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家伙，都一个个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宣扬“三纲五常”，兜售“人性论”， 为反动的统治秩序涂脂抹粉

《千字文》以很大篇幅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什么“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封建道德的五项原则。《千字文》的炮制者鼓吹人人都要把“五常”当作道德规范去做。做到了，就会“德建名立”，就会达到“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的目的，也就是当官做老爷了。还有什么“尺璧非

宝，寸阴是竞”。要人们连一星半点时间也别放过，去搞什么“四大五常”，为豪门世家培养继承人。他把“五常”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伦理关系联系起来，并把君臣、父子关系作为人伦的重点。胡说什么“资父事君，曰严与敬”，要人们用奉养父母严肃而恭敬的态度服侍君王，而且要做到“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即便死了也在所不惜，实际上是要人们为反动统治阶级去卖命。

《千字文》还集中笔墨在“仁”字上大作文章，大谈什么“仁慈隐恻，造次弗离”，告诫人们对于“爱人之心”、“隐恻之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随便丢掉。什么“仁慈隐恻”，不过是欺人之谈，这是在为反革命暴力涂脂抹粉。对于这类反动说教，毛主席曾经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说：“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把孔老二的“仁、勇、智”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叫做“团结、斗争、唯物论”。这是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和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林彪大叫“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他要他的法西斯匪徒“不成功便成仁”，为他效忠卖

命。他的死党陈伯达叫嚣：“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林彪一伙妄图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重新套在已经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头上，要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贩卖“中庸之道”，为挽救反动阶级的覆灭作垂死挣扎

《千字文》把“中庸之道”奉若神明，散布“上和和睦，夫唱妇随”，“罔谈彼短，靡恃己长”等反动思想，这一切都是宣传逆来顺受，安分守己，要劳动人民俯首贴耳，甘愿当牛做马，听任大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以及大官僚的奴役与压榨。

《千字文》的炮制者用了形形色色的华丽词藻，把“中庸之道”吹得天花乱坠，满嘴仁义道德，其实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中庸之道”的炮制者、卫道者们，那一个不是在高唱“公允、正直、忠厚、朴素”的同时，伴随着霍霍的磨刀声！

《千字文》明目张胆地说：“治本于农”，“税熟贡新”，是要广大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果实，老老实实交租纳税，把忍受地主阶级的超经济剥削当作本分，自己一家过着“饥咽糟糠”的穷困生活，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反抗。“鉴貌辨色”是看反动统治阶级的眼色行事。

这些对于劳动人民，就是“中庸”的“美德”了。

为了进一步麻痹人民，《千字文》还用佛家因果报应之说麻醉人们头脑。说什么“祸因恶积，福缘善庆”，诱使人们忍饥受寒，另修来世。如果不听这一套，进行反抗，破坏反动阶级的统治秩序，就要“诛斩贼盗，捕获叛亡”，实行血腥的镇压，杀头问斩，老幼都不得免。简直是杀气腾腾，什么“仁慈”，什么“忠厚”，都无影无踪了。

恩格斯说：“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乞求于孔孟的亡灵，大唱“中庸之道……合理”的挽歌，恶毒地以所谓“三不主义”处世，以“韦编三绝”的所谓治学精神教子，用“韬晦”之计隐蔽其反革命面目，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达到其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林彪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反动谬论，恶毒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妄想投降苏修，把我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广大革命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伎俩，与林彪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得他们一败涂地，彻底完蛋了。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反动的“中庸之道”，深

入批林批孔，坚持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载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日《天津日报》）

《名贤集》是孔孟之道的大杂烩

中共天津市武清县委理论小组

《名贤集》是南宋以来孔孟的徒子徒孙，在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搜集了一部分儒家所谓“名人”“贤士”的反动谬论及渗透孔孟之道的谚语、格言拼凑而成的。它杂乱无章，颠三倒四，前后重复，有的地方还“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是地地道道的反动言论的大杂烩。它的主要内容是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兜售封建的伦理道德；贩卖超阶级的“人性论”和反动的“中庸之道”；散布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和腐朽没落的人生观。此外，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破烂货，不胜一一枚举。

在这本反动小册子里，贯穿着一条顽固守旧、复辟倒退的黑线。它十分露骨地叫嚷“常怀克己心，法度要谨守”、“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让人们经常克制自己，谨慎地遵守封建地主阶级的“仁义”，苦读孔孟的“诗书”，拚死维护反动阶级的礼教，这就充分暴露了它妄图阻挡历史前进，让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永世长存的反动目的。

《名贤集》打着“名贤”招牌，贩卖孔孟之道，被

历代反动派奉为至宝，大肆兜售。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也都把《名贤集》宣扬的反动观点，作为他们反党篡权、阴谋复辟的思想武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对《名贤集》进行彻底的批判，清除封建思想的垃圾，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对于我们深入搞好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维护 和复辟反动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儒家门徒都把反动的“天命论”作为他们搞“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的理论根据，作为他们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反动思想武器。《名贤集》继承和发挥孔孟的“天命论”，大肆宣扬“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心命都不好，穷苦直到老”等谬论。这还不算，为了给他们的反动谬论添油加醋，“名贤集”把“因果报应”之类也塞进来，作为“天命论”的补充，大肆贩卖。

《名贤集》抛售的这些黑话无非是说，那些“君主”“圣贤”所以享受荣华富贵，是天生的“命好”“走运”，因而理所当然地应该统治劳动人民；而广大劳动人民所

以受欺压，当牛马，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是“命不好”、“无运至”，因而就得任人宰割。在封建制度日渐衰落，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情况下，《名贤集》向孔孟学舌，把人们贫、富、贵、贱、生、死、祸、福说成是“天”的意志，是“命”里的安排，这纯粹是为了麻痹人民，要劳动人民逆来顺受，不要“怨世界难”，不要起来造反，以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目的。

同历代反动派一样，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一个“天命论”的狂热鼓吹者。他声称从娘肚子里就带出来一个“特别灵”的好脑袋，有一种天賦之才，是“受于天”的“超人”。妄图借助“天意”当“国家的头”，以便实现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天命”，也根本没有什么“天生之才”。祸福不在天，翻身靠革命，斗争长才干，革命换新天。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客观真理。我们武清县小营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狠批了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天命论”，树立了人定胜天的思想，经过一年的奋战，全大队两千余亩粮食作物，亩产闯过了千斤关，比往年又有大幅度增产。这些不信“天命”靠革命的事实，是对林彪、孔老二散布的反动“天命论”的有力回击，是对《名贤集》的反动说教的有力批判。

二、兜售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 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反动秩序

《名贤集》的炮制者象历史上的腐儒们一样，对孔孟的反动伦理纲常大力鼓吹。它大弹“忠臣不怕死”、“国乱显忠臣”、“子孝父心宽”、“妻贤夫祸少”等陈词滥调，成套贩卖孔老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教条以及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说教，而且把它们更加具体化、通俗化，成为地主阶级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锁链。

“忠君”，是封建阶级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他们的“三纲五常”的总纲。《名贤集》宣扬“忠臣不怕死”、“国乱显忠臣”是叫那些封建帝王的爪牙、帮凶绝对忠于其主子，作到“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让臣仆豁出性命去维护反动头子的王冠宝座，而且越是在“民反”、“国乱”的情况下，越要卖力地去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显然，它所宣扬的这一套，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训练刽子手的反革命信条，是他们扼杀革命，镇压人民的无影屠刀。

“孝悌”是剥削阶级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石，是为“忠君”效劳的。孔老二曾自供：“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语道破了他鼓吹“孝悌”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奴隶起义，维护反动统治秩序。《名贤集》拾起孔老二

的这些牙慧，散布“子孝父心宽”、“祖宗虽远，祭祀宜诚”等，其用意是从根本上抹杀人的阶级性，用血缘关系来掩盖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用宗族观念来冲淡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毛主席说：“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名贤集》正是以“君为臣纲”维护封建政权，以“父为子纲”维护封建族权，以“夫为妻纲”维护封建夫权的黑标本。道德作为一定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的。《名贤集》兜售“忠君”、“孝悌”等封建伦理道德完全是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出发，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反动统治秩序服务的。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推行“克己复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反动伦理纲常也当成至宝，加以利用，要他的死党宣誓效“忠”，“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家父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的封建法西斯王朝，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三、贩卖超阶级的“人性论”和“中庸之道”，妄图瓦解人们的斗志

“人性论”和“中庸之道”同属剥削阶级的意识形

态，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掩盖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的烟幕弹，长期以来，一直被历代反动派奉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在《名贤集》里，这种滥调也比比皆是。

《名贤集》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那些地主豪绅们所以荣华富贵，是他们长久“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广大劳动人民当牛做马、受压迫受剥削，则是不“行好事”“积恶”的“恶报”。显然这是混淆黑白，散布迷信思想的无耻谎言。

“善”与“恶”，“好事”与“坏事”，在阶级社会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内容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标准，抽象的、超阶级的善恶观是根本不存在的。恩格斯说过：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反动阶级中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积善之家”。地主阶级的万贯家财，“**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根本不是“积善”而来，而是“积恶”而来。我们武清县过去有一个家有千亩良田、成百奴仆的大地主，自封为“宋大善人”。就是这个“大善人”，除了高租重利盘剥农民外，还用他特制的“秤”，一年向农民巧夺、讹诈几百担粮食。可见地主阶级的“好事”，就是劳动人民的灾难。《名贤集》鼓吹“善”，只不过是用以掩盖地主对农民血腥压迫和残酷剥削的遮羞布而已。其实质

是说，我剥削你就是“行善”，你要反抗就是“作恶”。戳穿了，这是维护反动统治，欺骗劳动人民的最伪善的说教。

《名贤集》还极力宣扬“休争闲气，日有平西”、“人到中年万事和”，什么“言多语失”、“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等。这实际上是让劳动人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不要有愤怒和不满的表示，更不要进行反抗和斗争，只能忍气吞声，当一个俯首帖耳的奴隶，否则就会招惹是非，带来灾祸。这完全是孔老二叫嚷的“和为贵，忍为高”的翻版，是麻痹人民思想的毒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就把“中庸”说成是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以此束缚人民的手脚，防止奴隶“犯上作乱”。后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都发现了这个“秘诀”，把“中庸之道”看做维护反动统治的“天下之大本”，而争传袭用。他们以为只要人们都相信“中庸”，变得顺从，剥削阶级的“太平盛世”就能永远存在下去。从孔老二一伙的这种痴心妄想中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正是刽子手杀人时所念的“和平经”。林彪这个现代复辟狂，把“中庸之道”从孔家店的垃圾堆里拣了出来，躲在阴暗角落里狂吠“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宣扬“中庸之道……合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斗绝了”“做绝了”，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让他“名正言顺”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就

充分暴露了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人类社会是在长期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向前发展的，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妄图用超阶级的“人性论”和“中庸之道”拖住滚滚向前的历史巨轮是完全徒劳的。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武装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四、散布剥削阶级的反动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妄图毒化劳动人民的思想

在阶级社会中，人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对待这样一个人生观问题，不同的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

《名贤集》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等反动谬论，就是剥削阶级人生哲学的自白。

剥削阶级的人生观的核心就是“为我”二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们的信条，损人肥己是他们的阶级本性。那些奴隶主贵族、地主老财和资本家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个人发家致富，享受荣华富贵，概括来讲就是“追名逐利”、“升官发财”。为了名利他们对劳

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掠夺，达到了敲骨吸髓、杀鸡取卵的地步；为了名利，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到处钻营，就连“雁飞不到处”也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人为财死”正是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写照。由于利欲熏心，他们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是万能的东西，相信“财高语壮”、“钱能解语”，竭尽全力去争夺财富。

《名贤集》卖命地散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观，其目的：一是为了把他们的卑鄙的人生观说成是人的共同愿望，是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共同规律，从而为他们的剥削行为找到所谓理论根据，掩盖他们的累累罪恶和吃人本质；二是想以此来腐蚀和毒害劳动人民的灵魂，妄图用利己主义的反动说教来腐蚀人们的思想，瓦解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只想个人的私利，不触动和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名贤集》还贩卖了一整套散发着腐烂臭气的处世哲学，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长存君子道，须有称心时”，“见事知长短，人面识高低”，“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等等。这些黑话，赤裸裸地供认了地主阶级争权夺势的反动本领，狡猾奸诈的统治权术，玩弄两面三刀的虚伪作风。这里所说的“与人方便”是假的，而欺压劳动人民，使剥削者“称心”、“方便”，才是真实用意。至于他们所宣扬的一套徇私情、看风头，趋炎附势“韬晦之计”，更是腐烂得不可卒闻。

叛徒、卖国贼林彪把地主阶级这套处世哲学奉为信条，他不仅是一个拚命追逐“一本万利”的资产阶级野心家，而且是一个当面高喊什么“高举”、“紧跟”背后狠下毒手，妄图在“忍耐”中求得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以屈求伸”的反革命两面派权术，挽救不了林彪的可耻下场，他梦想恢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一个阶级。它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彻底铲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砸烂吃人的旧世界，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共产主义新世界。无产阶级“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他鄙弃一切私心，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解放全人类，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王进喜，把自己的钢筋铁骨献给了大庆油田的建设，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共产党员王国福，身居“长工屋”拉革命车不松套，“图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就是无产阶级对人生观问题的响亮回答，也是对一切剥削阶级人生哲学彻底的批判。

五、宣扬“尊孔读经”，鼓吹“读书做官”，为反动统治阶级训练“忠臣”“孝子”

《名贤集》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使他们后继有人，拚命兜售“子孙虽愚，诗书宜读”、“要人敬重”就得“勤学”、“一字千金价不多，会文会算有谁过，小身会文国家用，大汉空长做甚么”之类的黑货。它要人们必读的“诗书”，就是儒家的那套“四书五经”。它要人们追求的就是读书向上爬的邪路。它企图通过孔孟之道的教育，为日渐衰败的封建制度训练“忠臣”“孝子”。《名贤集》的炮制者如同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一样，把孔孟之道做为他们“传宗接代”的“灵丹妙药”，总是把“兴灭继绝”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因而极力鼓吹“尊孔读经”，诱使青少年追求功名利禄，以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明清王朝统治者的科举取仕，试题范围从不超出“四书五经”；窃国大盗袁世凯把孔老二的学说定为“国教”；独夫民贼蒋介石是靠尊孔反共起家的，把孔家店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所谓“八德”，作为他的“党魂”“国魂”。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要搞复辟倒退，培养“克己复礼”的接班人，也都乞灵于孔孟之道。刘

少奇的黑《修养》通篇充塞着孔孟之道，他还狂热鼓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林彪，除了要人们当“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之外，还亲自教子以“韦编三绝”的精神钻研孔孟之道，并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妄图把广大青年引上三脱离的邪路，充当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更挽救不了这些反革命复辟狂灭亡的命运。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抗拒不了的。不管《名贤集》的炮制者怎样鼓吹孔孟之道，到头来只能被革命人民锄掉当作肥料。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意识形态，要抓上层建筑，巩固我们的思想阵地，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小册子——《名贤集》批深批臭，坚持批林批孔，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全面专政！

（载《学习通讯》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神童诗》是培养反动阶级 接班人的黑教材

共青团天津市委机关 李 岩

历代反动没落阶级，为了维护其行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残酷剥削，编纂了许多充满孔孟之道毒汁的启蒙读物，用以培养他们的奴才和接班人。《神童诗》就是这样一本黑教材。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一个孔孟的忠实信徒、反动儒生汪洙编纂的，后经别人增补成集，以五字顺口溜的形式流传于世，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宋朝以来，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儒法斗争非常激烈。特别在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儒家派别的气焰甚嚣尘上，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动的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神童诗》正是在这个时候抛出来的。

对《神童诗》一类的东西，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视为至宝，把它作为培养本阶级的奴才和接班人的启蒙读物。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把它看做是“金玉良言”，用以毒害青少年。因此，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彻底批判《神童诗》，对于在青年工作

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是十分必要的。

《神童诗》以唯心论、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宣扬“天才”、“神童”、“上智下愚”等鄙视、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引诱青少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把青少年培养成为那个阶级接班人的一个根本问题。《神童诗》的作者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极力宣扬唯心论和唯心史观，甚至编造出所谓“神童”的谎言，妄图使青少年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甘心受他们统治，为他们服务。

《神童诗》一开头就提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它赤裸裸地向青少年灌输劳动是最可鄙的，劳动人民是“下品”，只有“天子”、“神童”才是“上智”，才是天生的统治者。这同孔老二、孟轲诬蔑劳动人民为“小人”、“野人”，叫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完全是一路货色。《神童诗》一方面向青少年灌输鄙视劳动、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唯心史观，一方面提出了“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的要求，要青少年从小立下一生为反动统治阶级尽忠尽孝的所谓“丈夫志”，去辅佐反动封建帝王，为加强反动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效劳。

培养青少年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

的一个根本区别。历代反动统治者，都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反动统治，都是建筑在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因此，他们要培养的接班人，必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然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是极端孤立和虚弱的，他们没有勇气把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公开提出来，而只能靠愚弄和欺骗来掩盖他们的反动目的。《神童诗》把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粉饰成“宫殿嵒崑耸，街衢竞物华”；把反动大地主的总头子——皇帝，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以此来引诱青少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来报答所谓“君恩”。这正是《神童诗》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必然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以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且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把“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之一，并教导我们：“要为大多数

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这就从无产阶级的特性和历史任务出发，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宗旨。这也是每个革命青少年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出于他反动阶级本性，极力反对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他把自己打扮成“生而知之”的“天才”，把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抛出了“黑三条”，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相对抗；林彪还无耻地叫大家都“当董仲舒”，要象朱熹那样“待人”。很显然，他是妄图让青年效法孔孟之流，复古倒退，在国内为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既然林彪是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他就必然把自己放在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地位，最后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那些报“君恩”、效忠反动统治阶级的“神童”们，早已和他们的主子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我们无产阶级的新一代，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朝气蓬勃，茁壮成长。

《神童诗》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引诱青少年

走“闭门修养”、“勤学”、“读经”的个人奋斗的道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坚持复古、倒退路线的“奴才”。

引导青少年走什么道路，也就是采取什么途径培养接班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路线，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和要求。《神童诗》以大量的笔墨，竭力鼓吹“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什么“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什么“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一句话，就是用功名利禄做钓饵，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引诱青少年为他们那一小撮人服务的一种手段。

怎样才能达到“玉殿传金榜”、“天府快先登”呢？《神童诗》说什么“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什么“古有千文义，须知后学通”，并且一再强调“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很明显，这就是要青少年脱离劳动，脱离实际，个人奋斗，闭门死啃《四书》、《五经》，一头扎进儒家的故纸堆里，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精神贵族。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之所以拚命引诱青少年走个人奋斗，脱离社会实践，闭门读经的道路，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复辟其反动统治的需要，是为他们那条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反动派既要用孔孟之道教育剥削阶级的后代，培养他们的“忠臣”和“孝子”；又要用孔孟之道来毒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使他们“存天理”，

“去人欲”，逆来顺受，不敢反抗斗争，以挽救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颓势。尽管在反动孔学的熏陶下，封建社会的风气愈加腐败，反动儒生愈加虚伪，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但这对反动统治阶级反而是有益无害。反动统治阶级就是要从这帮腐儒中，物色坚持复古、倒退路线的奴才和接班人。即使一些人还没有完全精通孔孟之道，也早就被《四书》、《五经》禁锢了头脑，缠住了手脚，至死也是些顺民，决不会“犯上作乱”。所以，强迫青少年“读经”，使他们“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无论是造就奴才也好，或是产生顺民也罢，对反动阶级的统治都起着巩固的作用。

无产阶级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上，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同。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三十五年前，就深刻批判了孔老二以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鼓吹的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反动谬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革命实践和生产劳动，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指出了正确的途径，为我国青年运动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然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对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进行了疯狂的反对和破坏。一个高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反对青少年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一个狂

吠“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恶毒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妄图用孔孟之道毒害人们，把青少年培养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然而，这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广大青年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锻炼，形成了一股革命洪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市先后共有三十多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他们的革命行动谱写了青年运动史上的新篇章。这些就是对《神童诗》所宣扬的“学而优则仕”等谬论的有力批判，也是对林彪的反革命谬论的有力回击。

《神童诗》以“光宗耀祖”、“黄金屋”、“颜如玉”为诱饵，灌输“享乐至上”的反动没落阶级腐朽的人生哲学，妄图把青少年腐蚀成为灵魂肮脏、思想空虚的精神贵族。

用什么样的生活目的教育青少年，帮助他们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是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的。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都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走向灭亡的阶级，是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的阶级。这种阶级特性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无止境地追求享乐，醉生梦死。他们把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把极尽享受，过着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看作是最大的幸福。他们总是要打出“享乐至上”的破旗，用他们

那套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对青少年进行腐蚀、毒害，引诱青少年踩着“读书做官”的阶梯，去追求“光宗耀祖”、“黄金屋”、“颜如玉”，过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寄生生活，妄图把青少年腐蚀成为灵魂肮脏、思想空虚的精神贵族，去做反动没落阶级的殉葬品。渗透孔孟毒汁的《神童诗》就无耻地宣扬“长安游冶子，日日醉春风”的“及时行乐”是最理想的生活，引诱青少年追求、向往剥削阶级公子哥儿的生活方式。

从孔老二到叛徒、卖国贼林彪，都无不向青少年灌输“享乐至上”的人生哲学。难道他们真的要给广大青少年以什么幸福吗？不！绝对不是。反动剥削阶级所鼓吹的享乐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累累的白骨堆上。它们的幸福，就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痛苦。孔老二不是鼓吹西周奴隶制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吗？正是在那个社会里，只有一小撮反动奴隶主贵族的荣华富贵，广大奴隶却遭受着野蛮的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反动统治阶级用“享乐至上”引诱青少年，不过是一种欺骗。林彪一伙也在用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毒害青少年，无非是想利用青少年，使他们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而已。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用这种思想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后代，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请听，战斗在伟大祖国前哨珍宝岛的战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发出了“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的豪迈誓言。战斗在大庆的青年工人，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为了祖国献石油，战风斗雪喜心头。战斗在大寨的铁姑娘队，站在虎头山，胸怀全世界，为了革命多打粮，不怕汗水流成河。他们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最崇高的理想，以艰苦奋斗干革命为最大的幸福。什么“黄金屋”“颜如玉”，什么“及时行乐”，“享乐至上”，我们革命的新一代早已把它看成臭不可闻的粪土。

总之，引导青少年为什么人、走什么路、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把青少年培养成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只要阶级、阶级斗争存在一天，这个斗争就不会止息。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少年，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为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奋斗。

（载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天津日报》）

一本毒害青少年的黑书

——批判反动小册子《弟子规》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理论小组

《弟子规》是清代康熙年间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产物。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肆意增加地租剥削，激起了农民接连不断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当时地主阶级的御用文人魏喜说过：“贫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遇饥馑，初犹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哨聚为盗。”（《救荒策》）这说明连反动统治阶级也看到当时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清代统治者还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激烈。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宝座。清王朝的所谓“康熙盛世”，表面上轰轰烈烈，赫赫扬扬，实际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空壳子，成了死而未僵的百足之虫。为了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封建地主阶级除了挥舞屠刀之外，更加乞灵于孔孟之道，妄图用儒家的反动伦理教条，“作为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他们拚命鼓吹孔老二那套忠孝节义，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反动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弟子规》（原名《蒙

训文》)便应运而生了。

《弟子规》的炮制者李毓秀,字子潜,山西绛州人,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程朱理学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弟子规》一经出笼,立刻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被捧为“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行”的“开蒙养正之最上乘”。一些地方官吏曾正式“飭令”所属州县,把《弟子规》列为私塾、义学的“童蒙必读书”,并且在祠堂、茶楼、书馆中广为宣讲。李毓秀本人也因此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恩宠”,在他死后不久,这个反动儒生的牌位,居然被抬进绛州“先贤祠”,当作“贤人”供奉起来。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地主阶级是如何重视《弟子规》这本黑书。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为了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对《弟子规》所散布的反动思想也拚命进行鼓吹。

这就充分说明,《弟子规》是适应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是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为了挽救其日渐崩溃的反动统治而炮制的舆论工具,是为一切反动阶级的罪恶统治扶危助倾的精神支柱。

一

《弟子规》以孔老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

语·学而》)为总纲,竭力兜售孔老二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贩卖反动的“人性论”和“中庸之道”,宣扬“尊孔读经”,……通篇都是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回的孔老二的破烂。

《弟子规》在对孔老二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的宣扬中,重点又是对“孝弟”的狂热鼓吹。它不但把“孝弟”吹成做人的第一标准(“首孝弟”),而且还煞费苦心制定出一套腐朽繁琐的臭规矩,强迫青少年遵守,要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终生为父母尽孝。即便是很小的事,也不能擅自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否则,就违背了做儿子的道德(“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

他们为什么要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呢?孔老二的得意门徒有子,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招供,他说:“孝顺父母,顺从兄长,而喜好触犯上层统治者的人是很少的,不喜好犯上,而却喜好造反的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这个根本,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弟可是仁的根本啊”。(“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在这种反动逻辑的基础上,孔老二得出了“孝慈,则忠”(《论语·为政》)的结论。可见“孝弟”和“忠君”是彼此相通的。孔孟之道把“孝弟”作为“仁”的根本,就是把“孝弟”作为“克己复礼”的

基本功。用这种基本功，把人们训练成“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的“孝子”，“君叫臣亡，臣不敢不亡”的“忠臣”。从而严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制度和父系家长制度，维持其反动腐朽的家族奴隶制。《弟子规》学着孔老二的腔调，把“孝弟”吹成做人的第一标准，其根本目的，也正是企图用这种思想羁绊把人们整治成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忠臣”、“顺民”，甘心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的驯服工具。从而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统治。

《弟子规》叫人们绝对地服从父母，为什么还说如果父母有错误儿子应该尽力规劝呢？（“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看来，封建礼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有维护封建礼教，才能维护封建统治，冲击了封建礼教，就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因此，谁违背了这个“礼”，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当他们的父母违背了“礼”的规范时，按照旧礼教培养起来的反动阶级的忠实奴才，当然要不惜一切地保卫“礼”，以至于“挞而无怨，死而不悔”的程度。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弟子规》鼓吹“孝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通过这种手段，使人自幼就养成一种忍辱屈从，唯唯诺诺的奴隶性格，成为死心塌地的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甘心情愿地成为剥削阶级反动礼教的殉葬品。

二

《弟子规》在极力鼓吹“孝弟”之后，紧接着就是对反革命的中庸之道进行了狂热的宣扬。它一方面恶毒诬蔑农民的革命斗争是什么“邪僻事”，诬蔑革命的舆论、进步的主张是什么“奸巧语”、“秽污词”；另一方面，大搞愚民政策，要广大劳动人民“莫谈国事”（“不关己，莫闲管”），不许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统治者压迫人民的“短”和剥削人民的“私”（“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即便是有气，也得憋在肚子里，忍气吞声，让它自泯自灭（“言语忍，忿自泯”）。它还威胁劳动人民说，谁要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短”与“私”，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那就是一种罪恶，就要“大祸临头”（“疾之甚，祸且作”）。鼓吹这种不分是非，不要斗争的中庸之道，就是妄图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人民的反抗。过去六号门的封建把头怕我们工人阶级揭露他们的罪恶，反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也说什么“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忍字头上一把刀，不忍不和祸来招”。这种中庸的调子，也是我们要我们“安分守己”地干活，服服帖帖地受气，甘心情愿当牛马，老老实实做绵羊，任凭他们的驱使和宰割。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极力鼓吹“中庸之道……合理”，胡说我们对苏修的斗争“斗绝了，作绝了”，狂

呼乱叫什么“绝则错”。其目的是妄图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否定我党坚持马列主义原则所进行的反帝反修的国际斗争，进一步加紧他们和帝修反的暗中勾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就不但暴露了他这个孔孟之道忠实信徒的丑恶嘴脸，也暴露了他这个苏修“超级间谍”的反革命面目。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专政是斗出来的，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斗出来的，我们铁路工人由奴隶变成主人也是斗出来的。他们越是反对斗争，我们就越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同帝修反斗，同一切阶级敌人斗，同一切旧道德观念、旧习惯势力斗，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

一切剥削阶级为了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在大肆鼓吹反动的中庸之道的同时，对孔老二的“人性论”也竭力兜售，以掩盖阶级社会里两个阶级你死我活斗争的本质。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统治为主旨的《弟子规》当然也不例外。《弟子规》为了欺骗麻痹人民，企图把充满着压迫剥削的阶级社会，描绘成这样一种图景：在对立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不欲，即速已”）的仁义道德关系，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不是压迫、剥削，而是“宽厚”、“仁慈”

（“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不是反抗、斗争，而是“亲近”、“友好”（“能亲仁，无限好”）。事实上，反动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把劳动人民当人看，而劳动人民也没有一天停止过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红楼梦》与《弟子规》出自同一时代，书中所讲的贾、王、薛、史四大家族，那一家的荣华富贵不是建立在亿万农民的累累白骨堆上？那吃斋念佛的王夫人，正是一巴掌致丫环金钏于死地的刽子手。其他的老爷、太太也都是对佣人、丫环非打则骂，使奴婢们有的跳井，有的上吊，有的被折磨而死。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不就是对《弟子规》宣扬的虚伪“人性论”的深刻揭露吗？历史上对立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共同的“欲”，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己不欲，即速已”的超阶级的“善心”。剥削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必然对劳动人民百般奴役，残酷压榨；劳动人民为了取得自己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彻底解放，就必然对剥削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二者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绝对不会有什么共同的人性，绝不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所早已证明的客观真理。

《弟子规》为了说明地主阶级道德的“全民性”，还把自然法则作为“人性论”的依据。说什么“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意思是说，由于人们同是一个“天”所覆盖，同是一个“地”所乘载，彼此都应

互敬互爱，相亲相善。这纯粹是骗人的迷魂汤。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一种思想感情的“爱”，是具有强烈的阶级倾向性的。我们六号门工人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亲不亲，阶级分”。封建把头不会爱装卸工，装卸工也绝不会去爱“鞭抽棍棒打”他们的封建把头。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喜欢鼓吹超阶级的“爱”，其实质，是妄想用“人性论”代替阶级论，以阶级调和的论调，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从而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消除人民的反抗行动。

四

《弟子规》还极力鼓吹“德政”，说什么“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但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政权，对被统治阶级来说，从来就不是什么“德政”。《弟子规》宣扬的所谓“德政”，不过是为了掩饰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反革命两手而已。列宁指出：“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反动阶级靠反革命暴力维持自己的统治，革命

人民靠革命暴力推翻反动统治，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就是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下发展起来的。《弟子规》宣扬“德政”，反对暴力的实质，是取消革命暴力，加强反革命的暴力。一方面在“德”、“仁义”、“忠恕”的幌子下，挥舞屠刀，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一方面用这套“德”、“仁义”、“忠恕”的麻醉药来麻痹人民，使被压迫阶级解除武装，放弃斗争，坐以待毙。阶级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鼓吹“德政”的骗子全都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们的“仁义”就是“吃人”，他们的“忠恕”就是屠杀，他们鼓吹的“德政”的全部内容，就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

叛徒、卖国贼林彪拣起孔孟之徒的牙慧，叫喊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妄图在“德政”的幌子下，混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界限，攻击革命暴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维护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封建阶级统治地位，《弟子规》也象其他反动小册子一样，起劲地鼓吹孔老二的“天命论”和“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把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说成是上帝赐给的，而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则是上帝决定的。叫嚷什么人天生就有贵贱之分（“同是人，类不齐”），什么无能无才者占大多数，应该被统治，而所谓德行高、才能大、高踞于众人之上的“圣人”、“贤人”，只是少数（“流俗众，

仁者希”）。这完全是孔老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翻版。这些陈词滥调，过去的封建把头常挂在嘴边，他们说：“我富，是福大造化大；你穷，是命里注定的，人不能和命争”，以此欺骗我们搬运工人。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也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回孔老二“天命论”的破旗，把自己说成什么“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天马”、“至贵”，把劳动人民说成什么只知“油盐酱醋柴”的“庸人”、“群氓”。可见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弟子规》为了培养反动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还拚命鼓吹“尊孔读经”。明确规定，不是孔老二及其信徒的书绝对不能读（“非圣书，屏勿视”），如果读了就会变痴变傻，损坏“心志”（“蔽聪明，坏心志”）。这就是说，它要儿童们“朝起早，夜眠迟”地读那些为孔孟之道立言著说的“四书五经”。由此不难看出《弟子规》炮制者的反动立场。他为了给地主阶级培育爪牙和“顺民”，不但极力倡导“尊孔读经”，而且还诱惑青少年“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何成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这就是说，不但要学会那套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理论，还得进行复辟、倒退的反革命活动，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尽忠效力”。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地主阶级统治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反动统治者大耍“尊孔读经”的鬼把戏，其根本用意，是企图用这种手段把人们的一切言行都纳入孔孟之道的

轨道，利用反动的意识形态，阻止社会的发展，以求得地主阶级封建宗法统治的苟延残喘。

大叛徒刘少奇和野心家林彪，效法孔老二及其信徒的反革命伎俩，也拚命鼓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人们“都当董仲舒”，其目的，也是妄图用这种复辟的理论训练复辟的爪牙，培养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骨干。

《弟子规》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一本黑书，是为地主阶级培养奴才的蓝本，是毒害青少年的毒草。这个反动小册子在中国流传了几百年，影响很深，流毒很广。它所散布的反动思想，至今仍然被用作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思想工具。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对它进行批判，是深入批林批孔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我们要继续保持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荡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一切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在斗争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载《学习通讯》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幼学琼林》批判

天津市市政工程局 史 正

《幼学琼林》是儒家利用便于记忆和应用的骈文（古代讲究音韵、辞藻、对偶的文章）形式，用说故事、讲典故、传知识的手法，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小册子，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其接班人和奴才而编写的。它和板着面孔说教的孔孟“经书”相配合，进行潜移默化的反动宣传。明朝末年，封建社会更加腐朽、没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消除法家进步思想影响，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便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加强对农民的专政。《幼学琼林》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炮制出来的。它从出笼以来，直到解放前夕，几百年间，不断增补修改，广为流传，一直在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效劳。

遵照列宁关于“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的教导，对《幼学琼林》这本充满毒素的反动小册子予以彻底批判，正是我们继续搞好批林批孔，从各个角落里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和影响，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地决裂，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战斗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幼学琼林》通篇宣扬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什么“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中庸之道、儒家教育思想，等等，无所不包。“克己复礼”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黑线。

这本反动小册子在其反动政治观中，首先强调了“礼”，说什么“视听言动准诸礼，忠信笃敬反诸身。”这是从孔老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那里照搬过来的。就是说，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的标准，而且要忠实、主动、谨慎、专一地去执行。这是一条无形的绳索，要把人们从精神到行动全给捆绑得死死的。

“礼”是什么？就是周礼。它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上层建筑，是西周时代奴隶主头子周公所制定的关于奴隶制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和与它相适应的礼节仪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从坚持复辟倒退，反对革新进步的政治需要出发，标榜什么“以礼治天下”。儒家的鼻祖孔老二总是竭力鼓吹“克己复礼”，要求按周礼进行统治，恢复西周奴隶制，开历史倒车。到了封建社会，经过孔老二徒子徒孙的加工，“礼”便转为封建统治阶级反对社会变革，维护反动统治的道德规范、行动准则了。

《幼学琼林》为了教训人们规规矩矩地服从反动阶级统治，从小做一个知“礼”的人，并把“礼”当成做人的

标准，竟胡说什么“人惟有礼，庶可免相鼠之刺；若徒能言，夫何异禽兽之心。”意思是说，人如果不知“礼”，还不如见了人能合拢前足的小老鼠呢。要是光说不做，不按“礼”行事，就和禽兽的心没有什么两样。《幼学琼林》把“礼”摆到了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就是要用它来束缚人们的革命行动，以便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

与“礼”相呼应，《幼学琼林》还向人们描绘了一个所谓“理想社会”，那就是孔老二“克己复礼”所要“复”回的西周奴隶社会。它竭力给奴隶社会涂脂抹粉，为奴隶主头子脸上贴金，胡说什么：“周礼有三宥之词”。就是说，周礼规定，对认识不到犯了罪的、偶尔过失犯了罪的、由于遗忘犯了罪的奴隶，都可以得到原谅。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对历史的肆意篡改。在奴隶社会，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丝毫没有人身自由，连生命也完全操纵在奴隶主手里。奴隶主可以任意处死、卖掉奴隶。奴隶主对奴隶有的只是残酷的阶级专政，哪里有什么“三宥之词”呢！

它还说：“泽及枯骨，西伯之深仁”，说的是奴隶主总头目周文王在令人挖水池时，挖出了死人骨头，赶紧叫人埋葬了。《幼学琼林》对这种意在美化奴隶主头子的编造，大加宣扬，并在注解中说：“天下闻之，曰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它把奴隶主总头目吹捧成为“理想社会”的理想帝王。只要有这样的“先王”来

发“仁爱”之心，那么，人民就得“救”了。其实，这个把死人骨头埋葬起来的“先王”，也正是把活着的奴隶用来殉葬的最凶的刽子手，他的“深仁”就是“吃人”。从那些出土的奴隶主坟墓里边，我们看到了多少被砍了头的，被断了肢的，被铁镣锁着就给活活埋掉的奴隶的遗骨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幼学琼林》怎么只字不提呢？这就不难看出，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正是反动阶级骗人的本事，其目的还是为了“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

“颂古”必然“非今”。“文教尚有遗传，艺术从兹退化”，就是颂古非今的反动说教。这里的“文教”，是指孔孟之道和他们的吃人的剥削制度、礼教。意思是说，多亏这些东西还流传下来，还在为他们继续发挥统治人民的作用。“艺术”，是指人民的生产制作技术。生产技术总是有所发明，有所改进的，怎么会越来越“退化”呢？在这批“好古迷”看来，一切都是越古越旧越好。孔老二不就为酒杯变了样而大发“觚不觚，觚哉，觚哉”的谬论吗？《幼学琼林》和孔老二唱的是一个调，它宣扬什么“上古时削木为吏，今日之淳风安在。”就是说，在奴隶社会里，只要把木头做的牌子插到犯罪的奴隶的住处，奴隶就得抱着木牌子来受审服罪。依没落的地主阶级来看，现在可不行了，人民动不动就造反，不再象奴隶那样老实，生产制作技术也不如先前社会了。这是何等反动的“颂古非今论”！按照这

种谬论，人类发展不是越来越进步，而是越来越退步，结论是：拉社会倒退回去。

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老二一生为“克己复礼”奔走呼号，没能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带着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的迷梦成了泡影，到头来被历史车轮轧得粉身碎骨。这就是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派的必然结局。

反动阶级和孔孟之徒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论证剥削阶级的“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和劳动人民的“造反无理”，在其炮制的《幼学琼林》里还突出地宣扬了孔老二“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提出了“幼慧者悉本天成”的谬论。“幼慧”就是从小与众不同，有特殊的才智，它是“天成”即先天就有的。为了论证这个反动观点，它把孔老二这个亡灵抬出来，胡说：“麟吐玉书，天生孔子之瑞”。这个荒诞传说，说的是孔老二降生时，麒麟（古代传说的一种动物）吐出一部玉书，这是天降孔老二的祥瑞兆。这是反动阶级为了吹捧孔老二，愚弄人民而编造的，目的是用唯心主义的说教，把孔老二打扮成“天生德于予”的“天降圣人”，利用孔孟之道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此外，它还列举了许多的“神童”。什么七岁的项橐有“天成”“幼慧”，连孔老二都拜他为师，向他求教。什么

司马光五岁就懂得砸破水缸救人，这就是他后来当宰相、反对法家王安石变法的天赋才能。还有个叫扬亿的，好几岁一直不会说话。有一天，家人抱他登楼，不小心撞了脑袋，一下子撞出了“幼慧”，于是这个“天才”不仅开口能言，而且一开口就是一首诗，真到了“神化”的地步。

神化，恰恰是反动阶级制造“生而知之”天才论的手法，其险恶用心是要人们对那些反动统治者奉若神明，俯首帖耳地听其摆布。按他们的说法，反动统治者是“生而知之”，不学就知，你不服从他、不崇拜他行吗！它用一根摸不着、看不见的尺子，把人们给分成三六九等。有的生来就是统治人的，有的生来就是被统治的。这种“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为他们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和统治人民编造的理论根据罢了。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把“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当作“复礼”的理论纲领。当他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时，就赤裸裸地打出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旗号，以“天才”自居，叫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胡说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这和《幼学琼林》里说的“天成”“幼慧”有什么两样呢？按照他们的这种奇谈怪论，天才的脑袋好比是个装满了才能的仓库，而学习和教育只不过是打开仓库大门的钥匙。没有“天

才”的人就等于是一个无货的仓库，即使用学习和教育的钥匙，把仓库的大门打开，也还是什么货色也没有。这完全是腐朽透顶了的唯心主义货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而这种聪明只能来自实践，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党，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离开实践，脱离群众的所谓“天才”是根本不存在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颠倒了思维和存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否认认识来源于人们的斗争实践，否认真理的客观存在，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幼学琼林》的炮制者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了“克己复礼”，为了在他们的“天才”和“圣贤”的宝座下面造就一伙帮凶的奴才，竭力宣扬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思想，从为什么读书，怎样读书，一直到教制、教规，全面系统地向儿童灌输。

它对入学儿童，首先提出来了“贺入学曰云程发轫”。“轫”是古代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发轫”就是起车的意思。用“发轫”比喻个人事业的开始。这句话是说，一入学就是升官发财、青云直上的开始。入学后，又进一步宣扬“宰相必用读书人”的滥调，以“官禄”为诱饵，激励他们发愤读书，并且要他们以孔老二“韦编三绝”的精神，一头栽进儒家经书中去，做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另一方面，又以“师道尊严”的残酷教

规，压迫学生死啃经书。提倡“敬师之至”、“尊师不怠”，“先生施教，弟子是则”，以老师威严，强迫学生信奉孔孟之道。这里选了“立雪程门”的故事，说宋代大儒程颐讲着“经书”，打起瞌睡来了，两个学生不敢离开，直到老师睡醒，叫他们走，他们才敢走，这时门外已经雪深三尺了。真是“事师如事君”，“师道尊严”到了何等地步！学生绝对服从老师，给老师以无上的“尊严”，这样才更便于传授剥削阶级反动思想。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逆来顺受、服服帖帖的“绵羊”，成为“尊孔卫道”、“克己复礼”的忠实奴才。这就是《幼学琼林》宣扬的反动教育思想的实质。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都是利用教育阵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把它作为巩固反动政权的一种工具。他们把“读书做官”定为青少年的理想与志愿，把“功名利禄”看得至高无上。这是由他们的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林彪要他的儿子学习孔老二“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其实质就是按照孔孟之道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同时，竭力推行“读书做官”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就是要用孔孟之道去腐蚀毒害青年，以便他搞资本主义复辟。

在读书问题上，不同的阶级是有着根本不同的目的和要求的。剥削阶级读书为做官；而无产阶级读书为革命。剥削阶级要求学生，以“成丹者，火候到，何惜烹

炼之功”的精神刻苦学习，是为了培养“心装孔孟，着眼个人”的寄生虫。而无产阶级要求学生刻苦学习，是为了培养革命的后一代，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培养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有着同剥削阶级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标准。毛主席从无产阶级的特性和历史任务出发，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作为革命青少年的奋斗目标。并号召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指出了正确途径。在毛主席光辉教育思想和教育路线指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开门办学”，师生下厂下乡，学工学农学军，走出去，请进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建立了新型师生关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哺育下，无产阶级新一代朝气蓬勃，茁壮成长。广大青年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争做“展翅雄鹰”，不做“温室花朵”。他们把“功名利禄”视为粪土，把“艰苦奋斗”当做幸福，以“战风斗雪喜心头”的革命精神奋战在各条战线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争当教育革命的闯将，向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猛烈开火，以实际行动批判了

《幼学琼林》宣扬的反动教育思想，给孔孟之流和林彪一伙的反动谬论以有力回击。

我们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把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小册子一本一本地进行彻底批判，深入批林批孔，夺取革命、生产的新胜利！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天津日报》）

《朱柏庐治家格言》 是欺世惑众的妖言

中共天津市西郊区委 郝红文

一

《朱柏庐治家格言》（以下简称《治家格言》），是明末清初反动儒生朱柏庐炮制的一本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小册子。它通篇是欺世惑众的妖言。

明朝末年，我国封建社会越来越走向衰落。这时，商品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出现萌芽，形成了新的市民阶层。皇室、贵族、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非常严重，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颓势，一方面血腥镇压农民的反抗，一方面大肆宣扬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强化对农民的专政，并掀起尊孔崇程的反革命逆流。“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明末，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焚毁儒家“经书”，捣毁尊孔崇程建筑，批判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横扫了理学所维护的封建秩序，一举推翻了明王朝。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清

贵族在农民起义军的血泊中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在用屠刀镇压劳动人民的同时，还广设“文字狱”，提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用来加强思想统治。朱柏庐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吹鼓手。

朱柏庐名用纯（其父死后，慕西晋儒生王裒“攀柏悲号，庐于墓侧”之义，自号柏庐），生于地主家庭。他站在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立场上，设馆讲学，著书立说，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朱柏庐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反动理论，炮制了《治家格言》。他所说的“治家”，不是指治劳动人民之家，而是治地主阶级之家，用以维护地主阶级之国。

二

《治家格言》宣扬剥削阶级人性论和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以便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它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方面，朱柏庐是身体力行的。他每天爬起来头一件事，就是谒家祠，诵《孝经》，年年如此。直到临死前，还从床上爬起，由人搀扶着，对着他的祖宗牌位磕头再拜，才伸腿闭眼，可谓孝到家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宣扬的是“宗族亲，一家人”。它从根本上抹杀了人的阶级性，用宗族关系掩盖阶级关系，混淆阶级阵线，是地地道道的剥削阶级

人性论。它的险恶用心，对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来说，就是在“同宗共祖”名义下，用“孝道”来维护其内部的“团结”，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对于劳动人民，则妄图用“孝道”来束缚人们的言行，处处依照祖先宗法办事，不准有丝毫的越轨行动，更不许造反。这种反动的人性论，是没落的地主阶级赖以苟延残喘的一根精神支柱，也是妄图束缚劳动人民的一条极大的绳索。

毛主席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亲不亲，阶级分。一切超阶级的“宗族亲”，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历史上反动阶级为了绞杀人民革命，无不拾起反动人性论这一破烂货。西郊区邓店大队有个恶霸地主，解放前，依靠国民党反动派，用“收不收，一斗二”的重利盘剥农民，用种种恶劣手段欺压农民，逼得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在解放前夕贫下中农要斗争他时，他一方面大讲“一笔写不出两个姓来”，妄图用“宗族亲”来麻痹群众；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组织反动力量，准备反攻倒算。贫下中农及时揭穿了他的反革命两手，同他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说明，“宗族亲”完全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欺骗和压迫的一种毒辣手段。

朱柏庐讲祭祖宗，行“孝道”，完全是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在反动阶级看来，如果人们都按照孔老二的“孝道”去做，再没有人“犯上作乱”，一个一个家

庭都治理好了，地主阶级的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可见，反动阶级讲的“孝”与“忠”是相通的，在家对祖宗、对父母尽孝，在社会上对帝王必然尽忠。朱柏庐大肆鼓吹“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听妇言……岂是丈夫”，就是要人们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绝对地服从地主阶级政权统治。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鼓吹“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并把“忠君”思想作为他的反革命精神支柱，要其死党为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效劳。然而，反动派梦想用旧道德的精神力量阻止历史前进，完全是徒劳的。

《治家格言》鼓吹孔孟的反动教育观，宣扬教子尊孔读经，为封建地主阶级培养接班人和奴才。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是有其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治家格言》宣扬的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教育思想，说什么：“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经书”即集孔孟学说之大成的“四书”、“五经”。它充满了颂古非今的复辟倒退思想，浸透着维护奴隶制等级观念，反映没落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经过反动统治阶级和孔孟之徒的吹捧，“经书”定为地主阶级子孙必读的教科书，成了封建科举考试的标准内容。不读“经书”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不经科举考试，就没有资格作官食禄。因此，《治家格

言》说：“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它一语道破了读“经书”的目的。它所说的“圣贤”就是象孔老二、孟轲那样的“巧伪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是反动阶级迫害劳动人民的刽子手和帮凶。培养这样的“圣贤”，就是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

在吃人的封建社会，谁家的子弟才能读“经书”呢？当然是地主阶级的后代了。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根本没有条件读书。但是，象反动阶级的思想毒害劳动人民一样，《治家格言》宣扬的“经书不可不读”，也毒害劳动人民。“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其目的，就是欺骗、麻痹劳动人民，给劳动人民套上重重精神枷锁，束缚人们的革命行动，以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朱柏庐要地主阶级的子孙读“经书”，就是把读“经书”当作地主阶级传宗接代的手段，为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服务，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和忠实奴才。

历代反动派都把孔孟之道当作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宣扬尊孔读经。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指使一些人抄录孔孟的大量言论，编成《四书集句》，教子尊孔读经，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同时竭力推行“读书做官”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把青年引向邪路。然而，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丝毫

也挽救不了林彪一伙必然覆灭的命运。

《治家格言》宣扬中庸之道，妄图麻痹劳动人民斗志，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它胡说：“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朱柏庐在这里兜售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充分暴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革命的恐惧心理。

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反孔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同地主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猛烈地抨击了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反动理学；把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对封建的纲常法纪进行了空前的扫荡。这种大长劳动人民志气的革命行动，使地主阶级代言人朱柏庐胆战心惊。他学着孔孟“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的腔调，叫嚷反动统治阶级内部要“戒争讼”、“戒多言”，就是在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要忍耐，少说话，以免露了马脚。这是“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它是一种取消斗争、放弃革命、腐蚀斗志的麻醉剂。就是让劳动人民不要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不要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俯首帖耳地忍受地主阶级的统治。不然的话，就会有所“失”，招致恶果。然而，人民要革命，社会要前进。朱柏庐的欺骗、恫吓是枉费心机的。

反动阶级高喊“戒争”、“中庸”，实际上他们对革命人民从来没有“中庸”过，只有残酷的镇压。孔老二叫嚷“中庸是最好的美德”，可是他当鲁司寇不久，

就迫不及待地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刽子手曾国藩手拿《中庸》书，口唱“中庸”调，却在三天内杀了太平军十多万人。独夫民贼蒋介石大谈中庸之道是“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他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叫嚷“中庸之道……合理”，一面磨刀霍霍，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些事实说明，反动派对人民并不“中庸”。

无产阶级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坚持革命斗争，社会才能前进。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我们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哲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治家格言》兜售反动的“天命论”，是为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反对社会变革效劳的。它在最后说：“守分安命，顺时听天。”意思是说，人人都要守于自己的本分，安于自己的命运，顺从“老天爷”的安排。什么是“本分”呢？照朱柏庐看来，剥削、压迫农民，过寄生虫生活，是地主阶级的本分；为地主阶级当牛做马，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是农民的本分。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孔老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翻版。

儒家和一切反动派鼓吹“天命论”，是为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孔老二鼓吹“死生有命，富贵

在天”，孟轲鼓吹“君权神授”，是为了维护、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服务的。在地主阶级日益保守和反动以后，它又为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反对社会变革效劳。明末，“朝廷失政”，“岁饥赋重”，大地主、官僚极端腐化，加上他们镇压人民的庞大军费支出，造成国库空虚，沉重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终于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朱柏庐叫嚷“守分安命，顺时听天”，完全是给反动阶级“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理论根据，以便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叛徒、卖国贼林彪自比“天马”，以“超人”自居，把“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当做“复礼”的理论纲领，这与历史上儒家鼓吹的“天命论”是一路货色。

然而，劳动人民从来不信“天命论”那套鬼话。李自成起义军冲破儒家“天命论”的思想罗网，指出，劳动人民受苦的原因，不是由于“天理”的安排，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他们号召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反，高举“杀富济贫”的大旗，明确提出要“取天下”，就是要推翻“承天应运”的明王朝，变地主阶级的天下为农民阶级的天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西郊区广大干部社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狠批了“天命论”，学习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大搞改土治碱，实行科学种田，改变了生产条

件，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使粮食获得了好收成。实践证明，劳动人民不信“天命”，坚信革命，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三

《治家格言》出笼以后，反动阶级象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惊喜欲狂”，“爱不忍释”，说它是“治家之门径”，“与六经四书并垂不朽”，简直捧到了天上！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吹捧它“尤脍炙人口”。于是，反动派多次刊印，广为发行，并印成字帖，刻成碑文，嵌做瓷匾，还把它塞进历书，无孔不入地传播。

历代反动阶级为什么如此狂热地吹捧《治家格言》呢？据说，“读此格言，奉行不倦，则已败之家可以复振，未败之家可以长保。”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他们妄图依靠它搞复辟倒退，实现“克己复礼”，复兴已经日益没落的地主阶级之家，维护其统治地位永世“长保”。不过，这只是他们的痴心妄想。革命洪流势不可挡。朱柏庐所要维护的封建制度，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

但是，阶级斗争并未结束。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旧的意识形态不会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垮台而自行消灭。“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

的。”《治家格言》里散布的反动思想，至今仍然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思想工具。这说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在失去了政权和生产资料以后，必然要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影响，来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务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要努力作战。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天津日报》）

《二十四孝图》批判

中共天津市东郊区委 董 皎

《二十四孝》是叙述古代所谓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它是由元朝一个腐儒郭居敬炮制的。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元朝贵族统治中国八十多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朝反动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方面残暴地镇压各族人民，一方面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用孔孟之道强化其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大搞尊孔读经，使“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二十四孝图》就是在这股反动逆流中，为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炮制出来的。它出笼以后，深得历代反动统治者的赏识，被大肆吹捧，历代反动儒生也一再续补、改编，反动封建统治日趋瓦解，“孝子”也就与日俱增，什么《女二十四孝图》、《百孝图》、《男女百孝图合传》、《二百四十孝图》等等，相继出笼，害人不浅，流毒甚广，必须彻底批判。

所谓“孝道”，是反动阶级妄图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反动之道，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孔老二生活的春秋末期，是奴隶制行将崩溃的时代。当时，奴隶们

不堪奴隶主的残酷压榨，不断暴动、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则与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孔老二竭力鼓吹“孝悌”。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奴隶主阶级内部都实行“孝悌”，即儿子对祖先、父母行“孝”，弟弟尊敬兄长，那末，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左右不就“团结”了吗？而且奴隶主实行“孝悌”，还会使奴隶变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起来，不会“犯上”，更不会“作乱”，这样，“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奴隶主的统治就稳稳当当了，即“天下归仁焉”。所以，孔老二把“孝悌”作为“克己复礼为仁”的根本，鼓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随着地主阶级日益走向反动，他们就转而乞灵于孔孟之道，标榜什么“以孝治天下”，于是，“孝道”就又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

“孝道”是吃人之道。在历代反动儒生们的装潢和修饰下，“孝”的表面被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然而，掩盖在它后面的却是吃人的“白厉厉”的牙齿。以《二十四孝图》里的“郭巨埋儿”为例。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被抱在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因他分母之食而正在挖窟窿，要将他埋掉了。“孝道”就是如此残酷的吃人之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反动的郭巨们每天都在那里挖掘深坑，嘴上高喊“忠孝节义”，然后把无数无辜

的人民“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恣蚊饱血”是又一幅血淋淋的画面：晋代八岁的吴猛为了“行孝”，夏夜脱光身子，躺在床上不动，让蚊子“恣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生怕蚊子去咬父母！还有，“涌泉跃鲤”的姜诗之妻，在暴风雨中还要逆流而上，为婆婆远途去取江水，回来稍迟一点，就以“母渴”为名，被“责而遣之”！曾参的妻子，也只因“蒸梨不熟”而被“休”！“孝道”，完全是反动统治阶级手中的一把杀人的屠刀，是欺骗和毒害劳动人民的一付麻醉剂，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在那“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旧礼教统治下，做“埋儿”“休妻”的“孝子”是不难的，但这样的孝子越多，被收拾的妇幼就越多，“孝治”的实行，靠的就正是大批大批儿童、妇女的牺牲，他们被休、被遣、被卖、被埋，成年累月，成千上万！

“孝道”是历代反动儒生的升官发财之道。鲁迅深刻地指出：“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反动儒生所以拚命宣扬“孝道”——这种虚伪的道德说教，就是为了“能换到官做”，他们的行“孝”，就是

行“诈”，目的是窃取美名，诈骗官职。《二十四孝图》的“孝子”，大多都是先行“诈”于前，接着便是升官于后的。王祥卧冰，不仅求到了鲤，也求得了官；替父亲夏天扇床、冬天暖被的黄香，后来竟当上了魏郡太守的大官；六岁就能偷桔子“遗亲”的陆绩，后来官至郁林太守；“哭竹生笋”的孟宗官做到司空；那个负母逃难的江革，不仅升为谏议大夫，还被皇帝封为“江巨孝”。宋朝的朱寿昌，原本是个疯狂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一天，忽然想起了早被抛弃多年的老母，发誓要“弃官”寻母，自然也是名利双收，孝名远扬，官位也连升几级。看，这些孝子们都是这样一些钻营功名利禄的家伙，是一批“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伪君子，是一批“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骗子！在他们的心目中，“孝道”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行孝”不过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早在先秦时期，奴隶起义领袖和法家人物就揭露、批判过孔老二鼓吹“孝道”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柳下跖面对面地怒斥孔老二是“妄作孝梯，而侥幸于封侯富贵”的“巧伪人”！韩非在揭露“儒以文乱法”的反动性时，举出一桩事：有个鲁国人参加了三次战斗，开了三次小差，他声称家有老父，开小差是为了行孝，于是被孔老二推举做了官。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所谓“孝子”，就是这样一批误国害民的社会渣滓，是

一批忠实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奴才。

把宣扬“天命论”的反动哲学思想与鼓吹“孝道”的反动伦理道德的说教结合在一起，是《二十四孝图》的一大特征。什么“天人感应”、“孝感神明”之类的无稽之谈，在《二十四孝图》中比比皆是。它开篇第一则便是“孝感动天”的胡诌：说是虞舜受父母虐待，仍然竭力尽孝，躬耕历山，感动了上天，就派大象帮他耕田，派众鸟助他锄草。还有什么郭巨埋儿“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王祥“卧冰求鲤”，双鲤跃冰而出；孟宗三冬“哭笋”，笋竟裂地而生；丁兰“刻木事亲”，木偶居然出血垂泪；曾参的母亲在家“啮指”，外出的曾参顿觉心痛……，真是迷信加谣言，荒谬绝伦，可谓“旧社会千奇百怪处处有，不及《二十四孝》样样全”！据古书记载，王祥继母“欲得生鱼，祥解褐扣冰，忽冰水间，有双鱼出游，祥垂纶而获”。明明是站着扣冰垂纶捕鱼，《二十四孝图》却非让王祥脱衣卧冰不可，而且一定是双鲤才行，因为这样一改，才“改”得王祥更“孝”，才“改”出了上天的威力。至于“埋儿”的郭巨，也并非寒门赤贫，而是富豪之家，其父死后，他将家财二千万分给两弟，独养其母，从而骗得了个“孝悌”的美名，而“埋儿”实为借故出金，“让金”也无非是大造舆论。就连清末《二百四十孝图》的编造者也认为：郭巨埋儿是“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不能不

“割爱”。对于“啮指心痛”一类荒诞无稽的鬼话，更是不值一驳。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严厉地责问道：如果曾母左臂痛，曾参也真的会左臂痛的话，那么“曾母病，曾子也病乎？曾母死，曾子辄死乎？”实际上呢，“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王充还指出，天派鸟兽助耕也决“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王充的据理分析，有力地戳穿了儒家之徒借天骗人的鬼把戏，批判了“天命论”的反动说教。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借天行骗是历代反动阶级惯用的伎俩，他们宣扬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就是妄图借“神权”强化族权，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二十四孝图》编造这些古怪离奇、荒诞不经的“诈文”，无非是妄图愚弄和欺骗人民，要人们相信：苦行“孝道”就会感动神明，天就会派鸟兽助耕，地就会赠献黄金，不仅美名远扬，而且会发家致富，甚至“苦孝”出个高官厚禄，名利双收，岂不美哉！所以，人们不要“犯上作乱”，而应当笃诚行孝，进而“移孝作忠”，即甘心做奴隶，自愿当牛马，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听任“父母官”们“恣渠膏血之饱”。

“乳姑不怠”中，那个“年高无齿”、吃了好几年人奶的长孙夫人，临死时“愿子孙妇如新妇孝敬”！长孙夫人的遗言道出了一切反动阶级的共同愿望：希望反动的“孝道”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反动剥削制度永存不灭。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二十四孝图》出笼不久，元朝的反动统治不就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土崩瓦解了吗？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宣告了剥削制度在中国大陆上的覆灭。这是历史的必然。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是反动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不甘心剥削制度的灭亡，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大书特书“克己复礼”的条幅，大肆宣扬“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妄图让他的一伙死党按照“事父母孝而不违”、“以从亲之令为孝”的信条，永远忠于林家父子，为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尽忠尽孝。但是，反动的“孝道”挽救不了剥削制度的必然灭亡，林彪一伙也和历史上一切妄图开倒车、搞复辟的反动小丑一样，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碾了个粉身碎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旧世界更加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我们一定要把反动的“孝道”及一切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七日《天津日报》）

批判阻挠妇女解放 的《改良女儿经》

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宣传部

《改良女儿经》是一本充满孔孟之道、宣扬儒家“女教”、“妇道”的所谓“通俗读物”。它出笼于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是明清以来出现的《女儿经》一类反动小册子的进一步演变和发挥。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明清时期，更加腐朽、反动。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人民的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越来越多地投入了革命洪流。如明代的唐赛儿，清代的王聪儿等，就是当时千千万万革命女英雄的杰出代表。太平天国革命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更是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妇女运动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更加沉重的打击。在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如明朝的李贽、清朝的曹雪芹等，也纷纷著书立说，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反动统治阶级面临“大厦将倾”的局势，在加强其刽子手职能的同时，更加施展其牧师的职能。他们搬来儒家歧

视、压迫妇女的一系列反动说教——从孔老二、孟轲到董仲舒、班固所炮制的女教诫条；从东汉班昭的《女诫》到唐朝的《女论语》、《女孝经》；从宋儒朱熹的《小学》到明仁孝皇后的《内训》等，东拼西凑，编成《女儿经》、《女小儿语》、《女三字经》、《闺训千字文》、《绣阁金针》等多种反动小册子，来散布毒素。

到十九世纪末，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如谭嗣同等人提出了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代替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的主张，这在当时对妇女运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动没落的封建顽固派，对农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洪流以及初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挑战，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不甘心旧制度的覆灭，“以种种努力来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把《女儿经》一类坏书修修补补，贴上时髦的改良主义标签，以《改良女儿经》的名义拿出来招摇过市，继续放毒。由此不难看出，《改良女儿经》的出笼，是对农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顽固对抗，是对当时进步思想的阴险反扑，是没落封建统治阶级大搞“克己复礼”的需要。

《改良女儿经》以孔孟之道为理论根据，竭力宣扬“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反动伦理道德，妄图把妇女培养成合乎反动统治阶级需要的“贤妻”、“良

母”、“孝女”、“节妇”，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

—

《改良女儿经》通篇贯穿着一条“男尊女卑”的黑线，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训诫妇女“遵三从，行四德”。所谓“三从”，是要求女子出嫁前服从父兄，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服从儿子。也就是要妇女从生到死都必须受男子的支配，做男子的附庸。“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妇德”，是要妇女严守封建礼教，绝对服从男人，单方面保持贞操。实际上是剥夺妇女的人身权利，把妇女置于任人蹂躏和宰割的地位。所谓“妇言”，是要妇女说话符合封建礼教，要少说话，在是非面前不开口。实际上是剥夺妇女的发言权，要妇女去做政治上的哑巴。所谓“妇容”，是要妇女梳洗打扮、仪表穿戴都要合乎封建规矩。实际上正如鲁迅所揭露的那样，是要妇女成为一种“好玩具”。所谓“妇功”，是要妇女专心家务、伺候好公婆、丈夫。实际上是划地为牢，让妇女充当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剥夺她们参加社会生产和政治活动的一切权利。总之，“四德”就是反动剥削阶级束缚和奴役妇女的吃人道德。

《改良女儿经》把这套反动诫条奉为至宝，不厌其烦地大肆宣扬。什么“夫君话，就顺应，不是处，也要噤”呀；什么“修己身，如履冰”，“勿唧唧，道短

长”呀；什么“凡笑语，莫高声”，“能针黹，方成人”呀，甚至连如何“着酱醋”、“晒东西”都说到了。为进一步推销“三从四德”的黑货，这本书在最后还列举了古代一些为“遵三从，行四德”而跳粪坑、剁胳膊、割鼻子的所谓“贤妇女”作为“样板”，要广大妇女“宜以之，为法则”。用死人整活人，其手段何等卑鄙、险恶！

毛主席指出，在旧社会，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儒家关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反动说教，就是这种夫权的精神支柱。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没有经济权利，更“不可使预政”。男子可以任意打骂甚至虐杀妻子，可以随便讨小老婆和休妻，而妇女则要在反动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抱着走”。尤为残忍的是“妇德”中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丈夫死了，做妻子的不能改嫁，或者忍饥挨饿终身守寡，或者随同丈夫一起死掉，成为什么“贞节烈女”。就在我区白塘口公社的前辛庄大队，解放前有位妇女，结婚半年，丈夫死了。她的一个满脑袋装着孔孟之道的大伯子，便向她大讲《改良女儿经》等坏书里“烈女殉夫”的故事，并说什么“丈夫是你的天，现在天已经塌了，你要是失了节，坏了我家名声可

不行！”在封建礼教的威逼下，这位妇女“绝粒”七、八天，活活地饿死了！当时的反动官府对此大加表彰，给她挂了一块匾，上写“节烈可风”。实际上，这种现象确已成风。据《天津县新志》记载，这样的“烈女”、“节妇”在光绪以前有1,160多个，光绪以后又有2,440多个，加起来是3,600多个，看吧，一个小小的天津县就这样多，全国更可想而知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男女不平等是阶级不平等的反映，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和剥削，男女共同劳动，分享劳动果实，地位是平等的，妇女是受尊重的。只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产生，奴隶主阶级便把妇女如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攫为己有，使妇女一方面从事无休止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来保证私有制代代相传。这样，妇女就由同男子平等的地位降到了从属的地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反动诫条，就是这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可见，夫权的建立和对妇女的压迫，绝不是什麼超阶级的男女两性的对立，而是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之一。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复古、守旧、倒退、复辟的反动政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拼命强化夫权，不但是他们必须用男性传宗接代，以维护私有财产和世袭统

治地位的需要，而且是他们束缚妇女，妄图阻止“半边天”起来造反的需要。《改良女儿经》狂热推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黑货，就是妄图把求解放的广大妇女永远关进封建牢笼里，阻止她们革命，使她们服服帖帖地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以挽救封建社会的灭亡。

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需要，也大念“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陈词滥调，什么“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什么“妇女不能管理国家大事”，妄图使广大妇女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新中国的妇女拖回到吃人的旧社会，再过那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但是，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新中国的妇女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勇敢地顶起了社会主义的“半边天”。

二

《改良女儿经》训诫妇女要做到“父母骂，不做声”，“公婆言，莫记恨”，“事公姑，如捧盈”（象捧着满满一盆水走路那样侍奉公婆）；还要做到“哥嫂前，请教训”，“伯叔话，休要管”，“姆婶事，决莫言”；如果没有生儿子，就是“最不孝”，就要劝丈夫娶小老婆。这是儒家的“孝悌”之道在妇女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是套在妇女身上的又一具枷锁。它使公婆虐待

儿媳合法化，使剥削阶级男子讨小老婆的丑恶行为合法化，使妇女受尽了凌辱和宰割。看看解放前我区葛沽街一位妇女的遭遇吧。她的婆婆病了，她丈夫为了尽“孝道”便强迫她“割股事亲”。她只好忍着剧痛，割下大腿上的一块肉来，一手托着肉，一手举着香，一步一个头磕到离家很远的的一个庙里，从香炉里抓了把香灰撒到肉上，然后把肉拿回来熬成汤给她婆婆喝。看，这就是孔孟的“孝悌”之道！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孝道”纯粹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办法”（鲁迅语），是“孝”里藏刀的吃人肉喝人血之道！

《改良女儿经》对“孝”道大吹大擂，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使妇女不惜一切地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尽义务，养成对长辈以至对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绝对服从的奴才性格。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其祖师爷的“孝悌”之道，一方面要求其反党集团内部以“从亲之令为孝”、“事父母敬而不违”的精神“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对“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用以腐蚀和毒害广大群众。这充分暴露了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世袭法西斯王朝的狼子野心。

三

《改良女儿经》胡说什么“各自居，也要命，命不

遇，只是贫”，要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妇女听天由命，“守淡薄，安本分”，默默地“积阴德，贻子孙”，以修来世。这是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所谓“命”，是什么货色呢？汉儒董仲舒解释说：“命者，天之令也。”就是说，“命”是老天爷的命令。这纯粹是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科学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告诉我们，庞大的宇宙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神仙老天爷。

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历史上一切开倒车的反动派，手中没有半点真理，都幻想从人间以外找来他们的理论根据，妄图借用“天命”的神秘力量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孔老二为挽救奴隶制的灭亡，极力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劳动人民因受压迫剥削而贫穷，把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而发家致富的罪恶行为，统统说成是“天命”决定的，并胡说什么谁要是起来反抗，就是违背了“天意”，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之流为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把孔孟关于“天命”的谬论进一步发挥成什么“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什么“天理”。这套黑货，自先秦以来就受到历代法家的多次批判，特别是受到农民起义的多次冲击。但是，《改良女儿经》又把它搬出来向广大劳动妇女兜售，妄图掩盖血淋淋的阶级压迫的事实，扼杀劳动妇女的革命造反精神，以挽救行将灭亡的地主阶级

黑暗统治。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广大劳动妇女踊跃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自己的阶级兄弟一起，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男女都一样”的新时代。广大劳动妇女的今天，不是什么“守淡薄，安本分”“等”来的，也不是什么“积阴德”“修”来的，而完全是靠无产阶级革命“斗”出来的。“革命能改变一切”，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昔日路边草，今日变成宝”。新旧社会两种制度，劳动妇女的两种境遇，雄辩地证明：劳动妇女过去受苦受难，绝不是什麼“命不遇”，而是反动阶级专政的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现在能过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幸福生活，也不是什麼“命”变好了，而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妇女地位的日益提高，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

毛主席指出：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

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改良女儿经》假惺惺地叫嚷什么“我家富，莫欺贫”；“奴婢们，也是人，饮食类，一般平，不是处，且宽忍”；“夫子贵，莫骄矜，出仕日，劝清政，抚百姓，劝宽仁”。这是孔孟“仁爱”、“仁政”反动谬论的翻版，是百分之百的欺世惑众之谈。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从来就没有有什么“富不欺贫”的剥削者，从来就没有主奴“一般平”的“君子国”，也从来没有对劳动人民讲“宽仁”、施“清政”的剥削阶级统治者。《改良女儿经》重弹这套滥调的险恶用心，就是为没落地主阶级涂脂抹粉，以超阶级的“人性”掩盖人的阶级性，掩盖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给劳动妇女造成一种幻想，似乎不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反动统治阶级发“善心”、行“宽仁”、施“清政”，就可以过上人人“一般平”的好日子。妄图以此涣散广大劳动妇女的革命斗志，使她们不再“异心生”，不再造地主的反，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引入歧途。

《改良女儿经》还叫嚷什么“是与非，甚勿理”，“无是非，是贤良”，极力向广大妇女灌输“中庸之道”和反动处世哲学的毒汁。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与非”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甚勿理”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里，“是”与“非”有着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的是非观。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看作“是”，把劳动人民的反抗

斗争以为“非”；而劳动人民恰恰与此相反。炮制《改良女儿经》的总后台慈禧，不就是把中国革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看作“非”，而把“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屠杀人民，投降卖国作为她最大的“是”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阶级的“无是非”、“都说好”的“贤慧人”。《改良女儿经》鼓吹“无是非”的谬论，其实质是要广大劳动妇女以没落封建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以反动的孔孟之道去“修己身”。它声嘶力竭地训诫妇女“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义”，守“孝悌”，听“天命”，“早完粮”，这难道是要妇女“是与非，甚勿理”吗？戳穿西洋镜，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清末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空前尖锐的政治背景下，《改良女儿经》宣扬“是与非，甚勿理”的中庸之道和反动处世哲学，就是妄图使广大劳动妇女放弃对革命真理的追求，从反帝反封建反孔孟之道的战场上退下来，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服服帖帖地接受反动的封建统治，甘当奴下奴，甘当亡国奴。

推行“读经传世”的儒家路线，是《改良女儿经》的又一反动内容。它叫嚷什么“有儿女，不可轻，抚育大，继宗承”，“或读书，莫鄙吝”，“训礼义，教孝经”。我们知道，孔孟之道、儒家“经典”，是反动派上台时的“统治经”，下台时的“复辟经”，是阴谋家的“权术经”，是巧伪人的“修养经”，是叛徒卖国贼的“贩卖经”。《改良女儿经》要妇女不惜一切地教子

读经学礼，就是妄图为推行倒退复辟、投降卖国的反动路线培养爪牙鹰犬，为反动腐朽的地主政权培养奴才和接班人。

“仁义道德”、“中庸之道”和“教子读经”等儒家黑货，既为维护和复辟旧制度服务，又为扼杀妇女解放运动效劳，是反动派惯用的思想武器。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狂热鼓吹和推销这套黑货，进一步表明了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狂，同时也是妇女彻底解放的凶恶敌人。

我国广大劳动妇女，在反动阶级专政的旧社会里，深受孔孟之道毒害，受尽了剥削、欺压、凌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路线指引下，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得到了翻身解放。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为妇女的解放开辟了广阔道路。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改良女儿经》所散布的剥削阶级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把妇女看成奴隶和附庸的思想余毒还未彻底肃清，为了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我们也必须彻底批判《改良女儿经》等坏书，并肃清其流毒。

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前途是光明的，但“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我

们要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继续抓紧批林批孔，团结起来，为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

深批《女孝经》，顶起“半边天”

天津市电业局大批判组

被列入儒家“十三经”的《孝经》，是先秦孔孟之徒编凑的一本集中鼓吹儒家“孝”道的书。到了唐代，反动女儒生、朝散郎侯莫陈邈的老婆郑氏又专门以妇女为对象，炮制了《女孝经》。这本书和其他的“女教”书有所不同，它不是那样赤裸裸地罗列一整套束缚妇女的清规戒律，强人服从；而是以道貌岸然的劝“孝”说教来掩盖其“以理杀人”的刽子手面目，诱人就范。唯其如此，它对于妇女的毒害就越大。

《女孝经》出笼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天宝年间，开元虽称“盛世”，但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已隐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倾轧，矛盾重重。为了稳定封建秩序，最高统治集团利用国家机构，大注儒经。李隆基两次亲注《孝经》，颁布天下。《女孝经》的出笼，恰好适应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充当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狂热吹鼓手。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女教”书的浊流中，《女孝经》上承班昭《女诫》之余波，下开宋若莘《女论语》之先河，引起明清《女儿经》之类通俗读物的泛滥，产

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女教”书中它是刊本最多的一种，被封建统治者捧为“女教”经典，收入十几种丛书中，流毒很广。在反修防修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

《女孝经》用“孝”这条黑线贯穿全书，进行一系列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动说教。它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把“孝”吹得神乎其神，胡说什么“夫孝，广天地，厚人伦，动鬼神，感禽兽”，妄图使人相信做到了“孝”，就不但可以维护封建宗法伦理关系，而且还能上通天，下通地，感动鬼神、禽兽，得到它们的帮助。真是一派胡言，荒谬绝伦！我们知道，“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儒家始祖孔老二鼓吹“孝”，是妄图维持奴隶主氏族血缘关系，调和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同时用以“教化”奴隶，以维护对奴隶的统治。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孔孟之徒把“孝”这个道德信条接过来，经过改造，又使之成为维持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防止劳动人民“犯上作乱”的反动工具。封建帝王的所谓“以孝治天下”，其阶级实质正在于此。

《女孝经》的炮制者，把一整套禁锢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都与“孝”挂起来，宣扬什么“非礼教之法服不敢服，非诗书之法言不敢道，非信义之法行不敢行”，就是要妇女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都必须严格遵守反动儒家经典里所规定的“礼法”，“道德”。并说只有这样，才能“德行有成”，退则“保其身”不被休弃，进

则“名立于后世”，成为妇女的标杆，才算尽了“孝道”。总之，《女孝经》的要害就在于企图用“孝”这条精神锁链，把妇女囚禁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樊笼里，使她们安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不准反抗斗争。

无独有偶。现代中国的复辟狂刘少奇、林彪，和《女孝经》大唱同一腔调，叫嚷“忠孝节义”，“用其内容”，还宣扬什么妇女要作“新孝女”，妄图麻痹广大妇女的革命意志，以便于他们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真是白日作梦，枉费心机。

“男尊女卑”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是封建夫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女孝经》用大量篇幅宣扬男尊女卑，鼓吹“卑”、“顺”、“贞”、“节”。胡说什么“夫者，天也”，“移天事夫，其义远矣”，认为夫尊妇卑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它还举出“卑让恭俭，思尽妇道”的黑样板，力图证明妇女“卑下”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诱使妇女自卑自贱，任凭摆布。它要人们对女孩子从七岁起就进行“四德”（即“德”、“言”、“容”、“功”）教育。“妇德”是指处处要守“本分”、遵“礼法”，安于妇道。“妇言”是指要选择合乎孔孟之道的言辞讲话，不许乱说。“妇容”是指讲究衣饰，“为悦己者容”，博得丈夫的欢心。“妇功”是指努力纺织，自奉菲薄，甘当牛马，劳而无怨。总之，“四德”就是要强制广大妇女在封建家庭中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

《女孝经》声言：“古者女子出嫁曰归”、“归”就是归属，也就是成了丈夫的“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它大肆鼓吹“节”、“烈”，说什么“男有重婚之义，女无再醮之文”，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丈夫活着，你得象楚昭王的老婆姜氏那样，为夫守贞，宁被江水淹死，不离“渐台”（建在水中的房屋）。丈夫死了，你得象夏侯令女那样，为夫守节，“引刀割其鼻”。这种贞节观是反动统治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孔孟之徒迫害虐杀妇女的一把屠刀。封建地主阶级越是走向反动，对妇女的迫害也就越野蛮、凶残。北宋以后，在反动道学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毒害下，无数妇女被封建礼教吞噬了青春和生命，贞节牌坊越来越多，甚至出现许多逼女“殉节”的惨剧。事实说明，反动儒家“以理杀人”的软刀子，和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等的作用。鲁迅曾经愤怒地痛斥万恶旧社会逼得妇女“死得越惨越苦，他便烈得愈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女孝经》拚命宣扬“男尊女卑”，向广大妇女灌输自甘卑下的“妾妇之道”，就是企图扼杀劳动妇女的革命精神，把妇女培训成为“遵三从、行四德”的“贤妻、良母、孝女、节妇”，即适合反动统治阶级需要的顺民，以维护封建宗法秩序。刘少奇、林彪一伙出于地主资产阶级本性，也极端轻视妇女。辱骂妇女天生“愚笨”、“落后”，要妇女当“新贤妻”、“好老婆”，

“把精力放在丈夫身上”，这说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是妇女解放的大敌。

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列宁说：“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那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男尊女卑”的实质不是男女对立问题，而是阶级压迫的问题。因此，为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女孝经》还兜售“和”“廉”“慈”“让”等封建道德，中心是一个“和”字。其实质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就是“中庸之道”，阶级调和。它胡说什么要“居上勿傲，为下勿悖（造反），在丑（同类人）勿争”，就是说统治阶级妇女要装出一副“谦虚和善”的面孔，被压迫阶级妇女不要造反，同类妇女之间不要斗争。这样上下“和睦”，就可以“天下太平”了。配合这种反动说教，《女孝经》还树立了封建“淑女”的黑标本。据说这种“淑女”既会采取“廉”和“让”的手段把封建家庭治理得“九族和平”“祸乱不作”；又善于玩弄“和”与“慈”的怀柔政策，表示一点“恻隐之心”，以取得“左右”（丫头、婆子）和“小人”（奴仆）的欢心。不难看出，《女孝经》鼓吹“中庸之道”有着双重的反革命目的：向反动统治阶级妇女传授阴险狡诈的统治术；对劳动妇女麻醉她们反抗压迫的斗争意志，诱骗她们凡事逆来顺受，处处委屈求全，甘心做那

种“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

在阶级社会里，“中庸之道”、“阶级调和论”，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自欺欺人的一种骗术。在地主资产阶级家庭里，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中庸”、“和平”。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讲的虚伪的“和”、“慈”，也是为了掩饰他们吃人的狰狞面目，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在历史上，叫喊“中庸”最厉害的曾国藩、蒋介石之流，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卖国投降的大卖国贼。这就是反动派的“中庸之道”。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极力宣扬“中庸之道合理”，攻击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骂绝了”，他们和孔老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我们必须坚持斗争哲学，把反动的“中庸之道”批倒批臭。

在妇女问题上的斗争，从来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无不宣扬男尊女卑，鼓吹对妇女“压迫有理”。而一些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则对儒家反动的妇女观进行过批判。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更是沉重打击了包括歧视、压迫妇女在内的封建伦理纲常，并且涌现了许多农民起义的女英雄。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妇女受压迫的阶级根源，争得妇女的解放。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阶

级根源和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扫除了几千年来压迫妇女的罪恶制度，广大妇女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做了国家的主人。毛主席教导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劳动妇女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就拿我们电业系统来说，解放前没有一个女工，现在电业女兵布满各个战斗岗位，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三八”女子带电作业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闯进高压“禁区”，掌握了超高压带电操作技术，降伏了电老虎，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孔孟之道，给了鼓吹“妇女落后”、“妇女无用”的林彪一伙一记响亮的耳光。

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再次明确规定“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这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妇女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几千年来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清除，《女孝经》这类毒书还在散发毒气，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载《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批判毒害劳动妇女的 封建专书《女诫》

天津市卫生局 丛 文

《女诫》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宣扬“女教”“妇道”的专书，是以孔孟之道的吃人礼教奴役、压迫妇女的一篇儒家代表作。它所宣扬的反动思想，成为一千多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妇女实行阶级压迫的女教经典，并为历代相继而出的毒害妇女的儒家反动小册子所遵循，流毒很深，影响极坏。当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彻底批判《女诫》，对于加深认识孔孟之道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充分发挥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现实意义。

一

《女诫》产生于东汉中期。它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它是和东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密不可分的。东汉时期，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豪门权贵争权割据，相互倾轧。由于政治腐败黑暗，土地兼并愈演愈

烈，造成广大农民贫困破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直接冲击着东汉的反动统治。反动统治阶级除了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外，迫切需要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束缚，于是更加乞灵于孔孟之道。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亲自召集儒生们开会，并由反动儒生班固撰集了《白虎通义》一书，以封建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白虎通义》中，以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体系为基础，把“三纲”列入“国献”，并把董仲舒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比附的尊卑上下等级关系更加明确化、绝对化，正式提出：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和最高政治准则。它还明确提出妇女“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把广大妇女置于被统治的最底层。当时的思想界弥漫着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女诫》便应运而生了。

《女诫》的炮制者班昭，是反动儒生班固的妹妹。班氏兄妹出身于豪门世家，是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与共、休戚相关的人物。班昭自幼“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受到封建豪族家门的精心豢养，熟读儒家诗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儒。她出入宫廷，讲学著说，被统治者拜为“女师”，赐号“曹大家”（家读姑），死后，皇太后亲自为她穿孝办丧，大肆吹捧宣扬。恩格斯曾经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

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班昭所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垂爱，正因为她是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她在《女诫》中所宣扬的反动儒家思想，正反映了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面对着农民运动冲击后的“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后汉书·儒林列传》）局面，班昭“每用惆怅”，深感“不闻妇礼”的严重性，她认为：“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则不能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因此，班昭撰写《女诫》，正是为了达到“教女”知“妇礼”，以“补益”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

孔老二极端鄙视妇女。过去儒家关于“女教”、“妇道”的言论散见于六经诸子的书籍中。《女诫》则继承了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和董仲舒“夫为妻纲”的反动说教，进一步加工改造。至此，儒家反动思想武库中便出现了一部有系统、有理论、有行动规范的“女教”、“妇道”的专著。《女诫》在用孔孟之道压迫奴役妇女方面起了传宗接代的作用。从孔老二、董仲舒到班昭，形成了一条完备的压迫摧残妇女的吃人礼教，适应了地主阶级反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需要。它不仅服务于东汉大地主阶级，也为后世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女诫》被后世的反动统治阶级奉为女教经典，把班昭捧为“女宗”。继《女诫》之后，唐代《女孝经》、《女论语》，明朝《女儿经》、《女训》、《女学》、

《闺范》，清朝《女三字经》、《改良女儿经》等儒家反动小册子纷纷出笼。《女诫》和后来宣扬压迫妇女的反动小册子，作为封建社会中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舆论。一千多年来，广大劳动妇女深受这种封建吃人礼教的迫害，陷入社会的万丈深渊，处于受压迫的最底层。

时至今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伙仍然拾起《女诫》的牙慧，作为他们“克己复礼”反动政治路线的组成部分。他们妄图以阴云遮盖“半边天”，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拼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女诫》批倒批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

《女诫》共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从夫妇关系到家庭地位，从妇女“天生稟德”到道德行为，无不包括在内。《女诫》反动内容的核心是“夫为妻纲”。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它包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专政制度和道德原则。“三纲”是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根本大纲。作为根本大纲之一的“夫为妻

纲”，它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一样，都是反动阶级用作统治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女诫》把“夫为妻纲”进一步具体化了，用心实在恶毒。

《女诫》宣扬妇女的生死祸福全由男人主宰，“得意于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于一人，是谓永讫”。就是说，得到丈夫的欢心如意，一生就有了依靠。反之，一生就算完了。用刘少奇、林彪之流的话来说就叫做：“你既然结婚就是做了人家的老婆，你就要做个好老婆”，“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因此，作为妻子必须“晚寝早作”“整齐酒食”，百般侍奉男人。《女诫》鼓吹“妇御于夫”是“人伦之大节”，“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即使丈夫死了，也必须守节一生，作“节妇”，这样就把妇女置于“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不知有多少妇女惨死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

为给“夫为妻纲”制造思想基础，《女诫》极力鼓吹妇女“卑弱”的反动谬论。它宣扬“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要妇女从生到死，一生都得处于“忍辱含垢，常若畏惧”的精神状态之中。它用荒谬的“阳尊阴卑”的唯心主义学说论证“男尊女卑”的反动说教，胡说什么“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又说“生男如狼，忧恐其尪；生女如鼠，忧恐其虎”。就是说，男的象虎狼一样凶猛还怕他怯弱，而

女子象老鼠一样怯弱还怕她凶猛。

《女诫》大力推崇“四行”。“四行”即“四德”，是指“动静有法”、“守节整齐”的“妇德”，“择词而说”的妇言，怎样仪表穿戴的“妇容”，以及如何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功”。为妇女规定这四种德行，就是妄图把广大妇女训练成为“贤妻、良母、孝女、节妇”，让她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违背封建礼教，丝毫不能触犯男子的尊严，甘当庸庸碌碌的家庭奴仆。

为了使广大妇女“曲从”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统治，《女诫》大肆宣扬“敬顺”是“妇人之大礼”，要妇女“敬”公婆、“和”叔妹、“顺”丈夫，“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就是说，对与不对，只有绝对服从。叫妇女“战战兢兢”，“勤不告劳”，忍气吞声，甘当牛马。《女诫》所宣扬这一套“曲从”思想，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贩卖的“中庸之道”的翻版，是欺骗被剥削者，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革命热情，破坏他们革命决心的精神鸦片。掀开《女诫》所宣扬“曲从”的帷幕，它的背后却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惨景，其目的就是要广大妇女培养成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驯服工具，以便让封建统治阶级任意蹂躏、宰割，去换取他们的“太平盛世”。

反动的“天命论”则是“夫为妻纲”的理论依据。

《女诫》胡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从而把“夫权”戴上一顶神圣的桂冠，“再

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广大妇女如若稍许反抗，那么就“行违神祇，天则罚之”，所以她们只能“听天由命”，忍受欺辱。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在“天”、“神”阴森恐怖的迫害下，不知有多少妇女成了反动“天命论”的殉葬品。反动儒家臆造的“天”、“神”，从来就是地下反动统治者的化身，是用来欺骗和麻痹广大妇女的偶像。

封建地主阶级为什么如此兜售和维护“夫为妻纲”呢？说穿了，就是因为它体现了地主阶级的特权，表达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反映了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利益。历史上反动儒家们，如此呕心沥血地宣扬“夫为妻纲”是大有用心的。他们实质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争得巩固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特别是广大妇女的统治权。叛徒、卖国贼林彪对压迫奴役妇女的孔孟之道顶礼膜拜，对反动的伦理纲常推崇备至，也重复“夫为妻纲”的陈词滥调，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广大妇女同男同志一道参加斗争，坚持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妇女问题，实际上是阶级斗争问题。对妇女的压迫，归根结底是由阶级压迫造成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罪恶。

在原始社会里，男女一样地参加劳动，一样地分享

劳动果实，没有私有财产和剥削，没有阶级，因此也就不存在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反映在男女地位上，必然是平等的。自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来，男女的社会地位则发生根本变化。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在奴隶社会中，女奴隶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只是从事繁重的劳动，采桑养蚕，纺纱织布，“为公子裳”。孔老二则诬蔑妇女是小人，并列在“难养”之列。在封建社会里，妇女依然是家庭中的奴隶，男女之间的绝对服从关系，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它与奴隶制所不同之处，就是通过法律、宗教、道德、教育等上层建筑使之固定下来，加以纲常化。《女诫》所鼓吹的“夫为妻纲”，就是要使广大妇女无条件地就范于封建统治的精神枷锁。自有阶级的社会以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有其阶级根源的。是阶级压迫，造成了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是阶级不平等使劳动妇女被压在人间地狱最底层。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历史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而这种斗争又往往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有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的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形成了席卷封建统治的革命风暴，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就在《女诫》出笼前后，爆发了数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广大妇女为了挣脱封建枷锁，走向反孔反封建的革命征途。比如，妇女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赤眉起义的先头部队，广大妇女挥戈上阵，英勇杀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在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也有许多贫苦妇女参加，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纲领，是对孔孟之徒炮制的“三纲五常”及束缚妇女四大绳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历代劳动妇女在农民起义中的光辉业绩，表现了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无比憎恨和争取妇女解放的强烈愿望。妇女解放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历史证明，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实现劳动妇女的翻身解放。“中华儿女多奇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女同志跨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被吸收入党，为党增加了新鲜血液，许多女同志，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加强了各级领导的战斗力。广大妇女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妇女，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争取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妇女解放斗争的实践，使她们深深感到，只有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才能得到自身的彻底解放。只有把自己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才能完成妇女解放斗争

的历史使命。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批判孔孟和林彪一伙在妇女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肃清它的流毒，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扫除妇女解放的思想障碍，清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天津日报》）